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84 号
出版日期：2024 年 7 月
电 话：(029) 83690153
邮 编：710061
电子邮箱：sxsyxb@126.com

2024 年 7 月 10 日出版

目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六个必须坚持”的生成逻辑、内涵所指及实践导向
..... 陈东 张昌祥 (5)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研究 李夕璨 (12)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以陕西高校为例 樊南希 樊笃涛 刘小莉 (18)

谢子长对陕甘边地区统一战线的探索与经验 ... 丁 健 田怡曼 (24)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基础 张嘉瑶 (29)

期刊基本参数：
CN61-1321/D * 1992 * A4 * 64 * zh * P * ￥7.50 * 2000 * 13 * 2024-02

参政党建设

新时代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价值取向、基本经验与提升路径
..... 刘宽忍 李正升 屈三成 张秋菊 黄 斌 郭宪洲 (34)

民族与宗教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审思
..... 杨 建 (39)

中华文化研究

《诗经》所见褒姒形象及其评价问题
——以《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大雅·瞻卬》为考察对象
..... 陈思瑞 白俊生 (43)

渭河孕育：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 王雄刚 (49)

元典、原生态——黄河文化陕西段的文化标识及现实价值
..... 王雪婴 (55)

观察与思考

社区社会组织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 张晓铮 (60)

声 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凡是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各种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本刊顾问

崔 歆 周 静 袁炜伟 朱 丽

编辑委员会

袁炜伟 燕连福 苏玉波 陈晓莉
何 诚 张 涛 尹夏清 王西军
张 玮

主 编：袁炜伟

执行主编：张 玮

编辑部主任：王目星

责 任 编 辑：蒙晓哲 王目星
王曉璉 黃曉翠
唐 倩 馬文婷
李 蕾 張嘉瑤
溫 晔 劉 悅

“六个必须坚持”的生成逻辑、 内涵所指及实践导向

陈东 张昌祥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构成了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从生成逻辑来看,它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重要依托,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以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为实践基础。从内涵所指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不息的精神特质,是解决时代问题和回应人民心声的宝典,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洞察世界潮流浩荡和拓展全局性眼光的气魄。从实践导向来看,它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有力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中国坐标,为深化“两个结合”提供思想原则,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明前进方向,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供根本遵循,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胸襟格局。

关键词:“六个必须坚持” 生成逻辑 内涵所指 实践导向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3-0005-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植根于中华沃土,升华于党的伟大实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只有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生成逻辑、内涵所指及实践导向,才能深刻领悟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辩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ZZ033);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YB09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东,男,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张昌祥,男,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证关系,从而不断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必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六个必须坚持”的生成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2]。作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的极致凝炼,其生成具有特定的历史依托、理论根基和实践基础。

(一) 历史逻辑: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重要依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分别总结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的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和十个坚持的重要历史经验^[3]。“六个必须坚持”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也经历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沉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拓创新。它是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精髓,也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理论精华的继承和深化,凝练了新时代伟大奋斗的实践智慧,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迷思陋见,塑造了审思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思想引领,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出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民史观的认识。“六个必须坚持”同“十个坚持”始终贯穿于党的伟大奋斗和伟大实践,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重要依托,彰显着人民的伟大力量。

(二) 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

放奋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公开向全世界说明自己的观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至今仍指引我们向着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而奋进。“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蕴含在“六个必须坚持”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和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解放人民、重获自由运动的进程中凸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六个必须坚持”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扎根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红色革命沃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 实践逻辑:以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为实践基础

新时代的十年伟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人民所创造的,它积淀于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六个必须坚持”的提炼基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实践,其中排在首位的“坚持人民至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觉悟和诺言,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为民情怀;其余部分分别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精神、观念、思维和胸怀。“六个必须坚持”站在时代和实践的高度,是具有价值引领的思想,是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高度总结。新时代的十年伟大变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大同”“人类一体”的“胸怀天下”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世界东方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树

立社会主义大国威信、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也使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以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为前行的动力是“六个必须坚持”生成的实践基础,只有让“六个必须坚持”经受实践的淬炼,方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二、“六个必须坚持”的内涵所指

“六个必须坚持”联系密切、内涵丰富,构成了一个逻辑紧密的有机整体。深刻把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从“根本立场、精神特质、思想原则、实践要求、科学方法和宏大格局”等方面阐释“六个必须坚持”的深刻内涵。

(一) 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为追求全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创世之作”,其整篇都散发着人民性的光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人民观同属一脉又自成一体,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之所以拥有今天的一切成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基础上取得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5]因此,踏上新的征程,只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是我们前行的坚强后盾,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时刻接受让人民监督与批评。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人民情怀,始终与人民心连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理论的高度凝练。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需要每个共产党人深刻体悟和切实践行;以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带领人民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首先,正是因为坚守“人民至上”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人才将毕生的奋斗都致力于实现人民的最高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无论到什么时候、到哪里都不能丢。其次,我们的成长依靠人民、我们的奋斗为了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落脚点。最后,在新的“赶考”征程上,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同人民心连心、肩并肩、背靠背,用“坚持人民至上”来回应“赶考”之问。

(二) 坚持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不息的精神特质

坚持自信自立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在立足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汇聚砥砺奋进的磅礴伟力,一以贯之于党的全部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和发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体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设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中,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深刻阐释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还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革命事业一往无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立的政治底气。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奋斗中坚持自信自立,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实践，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传承了不息的精神特质。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坚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信心，以自信自立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

（三）坚持守正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原则

守正创新的本质就是要有科学态度和真理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革新和创新。守正与创新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守正是坚守正道和真理，任何时候都不背弃科学真理；创新是在守正的基础上，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既不“教条化”更不“本本化”。“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7]坚持守正创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唯有守正才能使我们在开辟新道路的征程上不断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守科学社会主义之正、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是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基石。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应使坚持守正创新更加走向自觉自信，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8]坚持守正创新，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心，既要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恒心，也要有创新理论和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决心，从而不断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时代问题和回应人民心声的宝典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导向是对时代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回答和揭示，二者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坚持问题导向实际上就是要充分运用矛盾的统一性和特殊性，面对不同问题的不同情况和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要有敏锐犀利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对于矛盾的统一性而言，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矛盾，事物的前进发展首先依靠解决矛盾而逐步往前推动；另一方面，对于矛盾的特殊性而言，任何客观存在事物的内外矛盾都有一定的差异和其各自的特点，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措施，才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迎接新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

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有发现问题的独到眼光。问题和矛盾要有主次之分，运用好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原理，就能把好时代的脉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中国共产党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矛盾的卓越智慧。

（五）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科学的思维方式

系统观念是充分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问题。质言之，站在对立统一的角度看待事物，充分认识矛盾之间存在的特殊性，善于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理论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坚持系统观念，其重点在于系统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坚持系统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成果。《论十大关系》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坚持系统观念的开创性思维和系统性观念，这一重要讲话阐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个问题，精准把握其中联系，从实际出发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具体国情，主要目的和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时期实践规律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全覆盖、多维度、全环节保护，系统整合山水林田湖草沙资源，使广袤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理念的坚持和运用使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成效更加凸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观念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六）坚持胸怀天下：洞察世界潮流浩荡和拓展眼光的气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9]青年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处深思自己关于职业选择时的崇高理想，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视为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袒露其为全人类谋幸福和关切人类命运前途的宽广胸襟。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肩负着改变工人阶级命运、挽救中国革命和实现民族解放的重任，并继承和践行马克思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儒家和合文化是毛泽东建构“和”之治国理念的关键，更是毛泽东形成世界大同、天下大同思想

的思想渊源，彰显了其博大胸襟和非凡气度。毛泽东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10]，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守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文明、交流互鉴和追求“和合与共”“和合共生”天下大同观的生动反映。“一带一路”提出的十年间，中国通过自己的行动与主张担当起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一带一路”加深了各区域民族间的交流，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新时代建设“一带一路”的十年，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同世界各国共建美好和谐家园。

三、“六个必须坚持”的实践导向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11]，要完成这一使命，就要充分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去观察时代、把握时代、推动时代、引领时代。

（一）坚持人民至上：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有力保障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2]。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坚持人民至上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力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本质属性的彰显，因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人民性。就民主自身优势而言，党的领导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保证；就

民主主体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每个公民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利和权力;就民主根本指向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归宿是人民群众,坚持人民至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价值诉求;就中西方民主比较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片面性、欺骗性、低效性”的多维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发展是党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和坚守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坚持人民至上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鲜明价值导向和有力保障。

(二) 坚持自信自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中国坐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信自立中建构而成。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中国式”,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是站在当代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回应本国“人民之问”的同时,更为希望迈进现代化的世界各国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恰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便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这一原则,在党的百年奋斗中积累了“坚持自信自立”这一重要历史经验;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自信自立,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更加系统、完整。总之,坚持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破除“现代化即西方化”迷思的“金钥匙”,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确立中国坐标,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回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三) 坚持守正创新:为深化“两个结合”提供了思想原则

“六个必须坚持”积极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需求。以“坚持守正创新”的

实践为导向,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勇于探求真理、求真守正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第一个结合”重要理论,诞生了标志着“第一个结合”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在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敢于批判自我与勇于超越自我的结果,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性再一次在新时代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彼此相融、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科学遵循,后者则为前者的开拓和创新筑牢历史根基。

(四) 坚持问题导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厘清前进方向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13]。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中阐述了“三大差别”将在共产主义实现时归于消失,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将“坚持问题导向”融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形成整体性思维,在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的同时,养成“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意识。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由是观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之举和本质诉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的凸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问题导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运用下必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厘清前进方向。

(五) 坚持系统观念：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供根本遵循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环境治理理念。生态系统的稳定不仅依赖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更需要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生命共同体。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使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对原生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中国共产党将坚持系统观念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有效推进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和治理。坚持系统观念对厘清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集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观念，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系统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用坚持系统观念回应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时代问题，是建设美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推进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生动回答。

(六) 坚持胸怀天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胸襟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以坚持胸怀天下的广博胸襟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打破隔阂、超越差异、跨越分歧，以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继而使不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国际形势演变来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演变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顺应全球发展大势，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之智和中国之治，以“一带一路”的实践彰显大国担当；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构想^[14]，是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和深刻把

握人类社会规律后提出的新型发展理念，它不仅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更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心系天下的胸襟格局。

【参考文献】

- [1] [7]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成龙. “六个必须坚持”的内在逻辑 [J]. 求索，2023 (4)：25-33.
-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7.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4.
- [11] 钟香妹，李海青.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分析视角 [J]. 理论导刊，2023 (12)：38-43.
- [12] 丁新改，田芝健. 习近平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六个重要论断 [J]. 党的文献，2023 (5)：3-10.
- [13] 赵亚楠，安俭.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学习习近平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J]. 党的文献，2021 (5)：36-43.
- [14] 张家飞，葛尊天.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J]. 行政与法，2023 (12)：31-40.

责任编辑：黄晓翠

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研究

李夕璨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1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从理论维度看，加强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时代价值。从历史进程看，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取得一系列经验、成就，是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制度优势。百余年来，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做好制度建设。从实践路径看，新时代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需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党的领导对统一战线领域的全覆盖、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全面理顺关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全面领导

中图分类号：D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4) 03-0012-06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1]。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考察，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点阐明了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2]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既能够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能够保证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发挥凝聚人心的强大法宝作用。

一、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

“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党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力量的根本前提与重要保证。从领导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理想、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领导统一战线具有必然性；从理论地位来看，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的历史方位来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应对国际形势的战略需要、是肩负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需要、是处理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需要。

收稿日期：2024-06-15

作者简介：李夕璨，女，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

(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特殊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人这种一切为了绝大多数人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决定了对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领导地位的天然使命诉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筑牢了人民群众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远大而坚定的理想,能够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员同甘共苦的政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不断团结奋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针对统一战线的不同领域精准施策,巩固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团结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是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成为引导党和人民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强调先锋队性质,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净化和自我革命,重视党的建设,不断消除党内不良作风和腐败现

象。科学的理论指引、不断完善的选贤任能机制、坚定不移的自我革命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使其具备广泛地吸引和紧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本领。

(二)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必须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领导力在实际工作领域中相互贯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5]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看,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

周恩来指出,“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6]。邓小平指出,“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7]。习近平强调,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8]。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加强,不断建立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级成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成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统一战线重大问题;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人民政协、统战部和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进一步明晰,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作用,统战部门作为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发挥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等重要作用,并要求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作。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三) 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时代价值

1. 应对国际形势的战略需要。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体来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大国博弈持续升温。这一时期,世界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交织叠加;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民族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竞争逐渐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安全等格局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这就需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下,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力量的政治优势、整合各种政治资源的制度优势来应对外界的不稳定性和挑战。

2. 肩负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面对新征程上的各种挑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力量和智慧,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更有效地激发不同社会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处理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需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阶级阶层互动流动更趋活跃,社会活力充分迸发。与此同时,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社会力量结成的政治联盟,社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对统一战线“团结谁联合谁,怎么团结联合”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统一战线通过吸纳、整合不同群体,又会反

作用于社会结构。只有着力把握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核心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定符合整体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才能真正凝心聚力,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制度优势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确立统一战线需要遵守的政治原则、需要遵循的政治方向和需要采取的重大方针政策。百余年来,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做好制度建设。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复杂严峻的革命形势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阶段(1921年7月—1927年7月),面对帝国主义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共二大会议期间审议通过了党关于统一战线第一个专门文件《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9]国共合作实现后,有力地推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阶段(1927年7月—1935年12月),在对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下,中国共产党选择农民作为主要同盟军,1928年6月,党的六大正式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要“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10]。为中国共产党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革命队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1935年12月—1945年8月),为了团结全国各

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同盟者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各阶层团结抗日争取胜利的旗帜,起到了政治领导的作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阶段(1945年8月—1949年10月),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全面阐述了党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由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为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部署,集中回答和解决“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如何巩固工农联盟、如何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等重大问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统一战线观念淡薄,比如,李维汉向毛泽东作出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简要报告》中提到:“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观点仍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许多同志都反映工作中的主要困难是‘做不通’。有些人认为‘统战干部是党内的党外干部’,‘是党内的右派’,‘统战工作不是正经的人搞的’……”^[11]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强调要在党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党内干部都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家都来担负起统战工作的职责。他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12]这一概括,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推动统一战线形成了“团结、稳定、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家形势的根本变化,对新时期统一战线赋予了爱国主义的重大内涵^[13]。1979年8月15日,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为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一方面要端正思想路线,加强政策教育,切实地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贯彻到统一战线工作中。“……在全党开展一次统战政策的再教育,……确实是当务之急。”^[14]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加强领导,把统战工作会议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指定书记分管工作,切实地抓起来。为充实党的领导力量,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要求“统战部门的干部要适当地充实和加强,统战部门所需增加的干部,由各地党委在干部编制总额中加以调整。会议认为在县一级一般都要设统战机构”^[15]。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江泽民在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要促进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改称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体现了中央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加强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建设,党中央于2015年5月18日印发了《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于2020年对其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¹⁶。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7]

三、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提高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迈上新台阶，汇聚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力量，形成广泛紧密的大团结。

（一）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引领

从党的百余年统战历程可以看到，对统战政策的宣传贯彻是各个历史时期党对统战工作领导的重点内容，能够有效弥合差异，增进认同，将党的政策主张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认知。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引领更加重要。面对当今社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现状，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复杂态势。需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引领，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成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切实提高统一战线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引领，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思想遵循。一方面，要加强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清楚其内在逻辑、历史生成、实践路径，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提高教育引导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突出思想引导针对性。统一战线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彼此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要根据统一战线成员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引导。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明，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在尊重统一战线各方成员思想多样性的前提下，探索统战成员主体间的利益交汇和思想共同点，进而筑牢共同的思想政治根基，做到平等相待、以理服人。

（二）加强党的领导对统一战线领域的全覆盖

新时代统战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并出现了新的现象和特点，其中网络统战领域和新阶层统战领域需要重点关注。随着我国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不断成熟与迅速普及，网民规模大幅增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等深受影响，网络统战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开展的重要新场域。习近平提到：“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网络大国。”^[18]互联网日益成为争取人心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和社会发育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运而生，数量短期大量增加。他们既是较为自由流动、独立发展的社会个体，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为应对这些新的情况，统战工作在上述领域有力展开，如2019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首次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总结成绩、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全面部署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2020年12月，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增加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强调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密切

的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等,应当发挥职能作用,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社会阶层在党和国家工作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但党对上述统战领域的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量大面广、构成复杂,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分散性强、流动性大,传统工作方法手段难以把他们有效组织起来,导致许多人游离于统战工作视野之外;一些干部不习惯“键对键”工作,既缺乏运用网络效应主动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识,也缺少运用网络技术开展统战工作的能力。面对这些状况,需要进一步找问题、补短板,加强党的领导对统一战线领域的全覆盖。

(三)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全面理顺关系

统战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涉及党政很多方面和部门。建立和完善统战工作领导机制,形成统一、精干、高效的工作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度保证,也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重要内容。新起点新征程,统战工作更加艰巨繁重,更需要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首先,提升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守团结合作的政治底线,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立场不含糊、原则不动摇。其次,落实各级党委(党组)统战工作主体责任。重视和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责任,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把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各级党委是统战工作的责任主体,《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地方党委的七项主体责任。最后,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推动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研究部署、协调指导、督查检查,发挥好各领域协调机制的作用,提升统战工

作水平。统战部要发挥好牵头协调作用,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与党委、政府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加强联系,做好统战系统内部的协调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参考文献】

- [1]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16 (01).
- [2] [16]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光明日报, 2022-7-31 (01).
- [3]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4.
- [5]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9/15/c_1127864230.htm
- [6] [11] [14] [15]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34, 35, 463, 493.
- [7]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88.
- [8] 本书编写组.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9.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5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32.
-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188-189.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51.
- [18]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加快建设网络强国 [EB/OL]. 中国网信网, 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60727/t20160727_522805449.shtml.

责任编辑: 王晓璿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以陕西高校为例

樊南希 樊笃涛 刘小莉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基于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现状及原因分析，可构建出科学规范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目标、原则、标准、范围及程序等体系。围绕该体系，从积极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等七个方面提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路径及对策，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无党派人士 认定 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4) 02-0018-0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身份，并不是所有无党派的知识分子都是无党派人士。是不是无党派人士是需要组织认定的，没有认定就不能称其为无党派人士。新时代无党派人士的认定和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对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一、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现状及原因分析

无党派人士与党派是相伴而生的，在我国，20世纪初出现政党后，也就出现了无党派人士，

初始无党派的知名人士称“社会贤达”。1948年5月5日，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为了与旧政协中“社会贤达”相区别，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称谓。1949年筹备新政协时，专门设置了“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界别。2000年后，中央下发文件，规范了称谓，正式使用“无党派人士”，随后人民政协也更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无党派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无党派人士的认定十分重要和必要，只有组织认定的，才可以称为“无党派人士”。那么，无党派人士认定的现状如何呢？

高校是无党派人士的聚集地。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高校，并注意选取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研究。调研形式采取走访与问卷相结合，通过统

收稿日期：2024-06-15

作者简介：樊南希，女，长安大学国资处干部，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樊笃涛，男，长安大学原统战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第五届理论研究会理事，陕西统一战线智库专家，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刘小莉，女，副研究员，长安大学统战部副处统战员，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

计和分析，基本上掌握了目前高校无党派人士认定现状。

(一)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现状

1. 高校无党派知识分子占比情况。

部属高校	省属高校	民办高校
64%	60%	34%

该调查数据表明，不同类型的高校，无党派知识分子的比例是不相同的，部属高校无党派知识分子占比要高过省属高校。

2. 高校无党派人士认定情况。

部属高校	省属高校	民办高校
25%	18%	11%

该调查数据表明，目前高校的无党派人士认定比例偏低。

3. 高校无党派人士认定机制建设情况。

部属高校	省属高校	民办高校
60%	53%	25%

该调查数据表明，对无党派人士的认定机制建设不够健全。

(二)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不认不定。不认不定是指既没有认真抓无党派知识分子工作，又没有对其认定。不认不定反映了一些高校对待无党派人士认定态度。

2. 认而不定。这种情况表明高校承认无党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也承认对其应该认定，但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并未落实。

3. 定而不认。虽然对无党派人士进行了认定，有登记，有花名册，但没有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以上三种情况，基本上反映了目前高校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状况。不管是不认不定、认而不定，还是定而不认，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对无党派人士的认定和队伍建设还不到位，而且不同类型高校，认定和队伍建设也不平衡，都需要大力推进和加强。

(三)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问题原因分析

1. 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不少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对无党

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工作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统战工作部门也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重视不够，工作热情不高，深入研究不到位，工作方法不多。在党外干部安排时，大多推荐民主党派成员，忽视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党外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它统战对象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把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作为统战工作重要方面，提高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抓紧抓好对其认定和队伍建设工作。

2. 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机制不够健全。应该说，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工作和队伍建设问题明确提出要求在整个统战工作中相对是比较晚的。要在短时间做好这些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机制涉及诸多方面，比如：认定的依据、认定的原则、认定的程序、认定的条件、认定办法、认定标准、认定建档、认定通知、认定退出等，这就要求统战工作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通过调查研究，创新和健全具有特色的认定体系和队伍建设举措。

3. 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应对手段和举措。无党派人士没有自身组织，而且分散在各行各业。统战部门对无党派人士工作无法通过组织体系进行，缺乏抓手，工作只能对人而不对组织，管理服务难以到位，群体力量难以充分发挥。近年来，尽管在无党派人士中开展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等，无党派人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应对手段和举措，使无党派人士自身建设缺陷不能有效地得到弥补、不同的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得到纠正，政治引导还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等。

二、构建科学规范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体系

构建科学规范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体系是无党派人士基础性工作，要做好这项基础

性工作,构建其认定和队伍建设体系尤为重要。何为科学规范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体系?就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按照规模适中、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要求,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其体系内容主要有:认定和队伍建设目标、认定和队伍建设原则、认定和队伍建设标准、认定和队伍建设范围、认定和队伍建设程序等。

(一) 认定和队伍建设目标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规范“无党派人士”认定和政治面貌使用工作,是加强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无党派人士的发现、培养、选拔和使用,有利于增强无党派人士政治上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有利于强化无党派人士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调动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 认定和队伍建设原则

无党派人士认定工作,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规模适中、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突出的要求,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具体是:党委领导、统战部门负责,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到先进性和代表性相统一、组织意志和个人意愿相统一、集中认定与日常管理相统一,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工作。

(三) 认定和队伍建设标准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党外代表人士认定的标准定义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士,其标准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1]。这个定义同样适用于无党派人士。政治坚定: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为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作贡献;业绩突出:在本领域、本专业和本本职工作中有比较深的造诣,做出一定的成绩和贡献;群众认同:社会责任感强,公众形象较好,所联系的群众普遍认可;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

(四) 认定和队伍建设比例和年龄

认定比例:由于各单位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人数、年龄、结构以及所做贡献、群众认同程度不同,对无党派人士认定的比例也应有所区别。从我们调研情况就有所反映。

部属高校	省属高校	民办高校
2%	1.5%	1%

从现实情况和多年的统战工作实践来看,这个比例是符合实际的,是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参考的。

认定年龄:无党派人士认定年龄是不应该有所限制的,但为了便于实施和操作,对年龄宜作要求。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认定无党派人士年龄以50岁以下较为合适。当然,对于代表性较强的,年龄可适度放宽。

(五) 认定和队伍建设范围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司法机关、乡镇(街道)领导职务;政府部门参事;担任区直属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在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或学术(专业)带头人等。

(六) 认定和队伍建设程序

程序在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辞海》对程序的解释是: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程序应该是科学的、规范的。因此,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程序涉及摸排推荐、审查认定、登记建档、通报告知、跟踪管理、认定退出等几个步骤及环节。摸排推荐:对照无党派人士认定目标、原则和范围,摸排本单位无党派人士认定推荐人选。推荐人选要在征求本人意见和对人选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摸排推荐环节由推荐单位具体实施。审查认定:按照认定比例和年龄要求,及时对各推荐单位报送的无党派人士推荐人选名单及有关材料审查,对人选作进一步考察了解,研究提出本级无党派人士认定名单,并将其反馈相关推荐单位。该步骤由统战部门具体实施。登记建档:各单位接到统战部门审查认定名单后,通知无党派人士本人填写《无党派人士登记表》,签署推荐单位审核意见后上报。统战部门对报送的《无党派人士登记表》进行复核确认,签署认定意

见,把登记表存入无党派人士档案的同时,通过相关推荐单位存入个人档案。此环节由推荐单位、统战部门分别实施。通报告知:将经审查认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通报同级组织、人事及无党派人士所在单位,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无党派人士本人,明确其政治面貌为“无党派人士”及应履行的职责。该步骤由统战部门组织实施。跟踪管理:由于无党派人士的特殊性,其与民主党派成员的管理有着较大的区别,统战部门要安排专人对其进行跟踪管理,不但清楚他们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教育引导工作,使之不断成长。具体来说,跟踪管理的教育引导重点是无党派人士在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上得到提高。认定退出:有认定加入就有认定退出,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有利于无党派人士的认定和队伍建设,有利于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作用。因此,要强化对无党派人士考察工作,对认证后政治不坚定、业绩不突出、群众不认同的,通过一定的程序使其退出,把新的符合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标准的吸收进来,确保达到认定和队伍建设的目标。

三、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路径及对策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地位、作用和身份明显不同于“群众”,但在实际工作中,“无党派人士”作为一类政治面貌,还存在认识不统一、使用不规范的情况。这已经影响到无党派人士在政治上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影响到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积极性,影响到无党派人士工作的开展,影响到无党派人士作用的发挥。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健全机制,科学规范,拓宽和丰富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的路径及对策。

(一) 深刻认识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工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正是把无党派人士纳入多党合作的范围,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使新型政党制度更具特色、更有活力;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无党派人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体,具有人才济济、智力密集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2];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重要基础。无党派人士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重要来源,由于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具有相同的社会基础,因而开展无党派人士认定对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从无党派的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特别是民主党派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和重要骨干也大都是从无党派人士中选拔出来的。因此,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既可以确保无党派代表人士实现新老交替,又可以为中共和民主党派推进组织建设提供支持;做好无党派人士认定是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途径。无党派人士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始终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对象。只有将广大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3]。

(二)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无党派人士认定涉及诸多方面,试想单打独斗,或者从某个方面突破,都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只有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才会有所收获。要在无党派知识分子中大力宣传无党派人士认定的重要意义,使其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认定工作。要建立科学规范的认定机制,对认定目标、认定原则、认定范围、认定程序等,进行量化细化,确保实施和操作。要落实认定责任制,由于认定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且环节多结点多,如果不能环环紧扣,就容易造成脱节或者影响质量,因此,实行认定工作的责任制十分必要。在这个系统工程实施操作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

个关系。一是无党派知识分子与无党派人士的关系。无党派知识分子称作“群众”，而无党派人士具有党派性质，要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二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推荐单位与统战部门的关系。总体来说，无党派人士来自基层单位，要从基层单位产生，但基层单位未发现、未推荐的，经统战部门发现且经过考察的同样可以作为无党派人士人选，基层推荐单位不能因此而产生分歧。三是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在认定工作中，质与量是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由于各部门的情况不同，党外知识分子贡献各异，因此，对质与量的理解在各单位的差异较大，要在认定人数比例、年龄的基础上，重质保量、宁缺勿滥。四是处理好认定与队伍建设的关系。认定是基础，队伍建设是必然结果。有什么样的认定就有什么样的队伍建设，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积极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具有代表性、政治性及组织性等特征，所以在其认定和队伍建设上就与一般的认定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是解决其主要问题、实现其效能的最好方法。代表性特征：我们只有随时发现、举荐、培养，才能使代表性人物脱颖而出；政治性特征：其特征规定了认定和队伍建设的严肃性、严谨性和科学性，不重视政治性特征，就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随意和偏向的现象；组织性特征：认定和队伍建设其本身就是组织行为，认定和队伍建设最容易检验组织能力，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是从组织上确保其健康发展的有力举措。比如，认定退出环节，如果不能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那不符合认定标准的无党派人士就不能退出，在职数一定的情况下，优秀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就不会得到认定，影响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影响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因此，构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尤为重要。

（四）以政治引导为主线加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

政治引导既是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的

规律之一，又是实现其建设的主要路径。实践表明，对无党派人士进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引导，有利于其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其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有利于激发其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和创造力。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要以政治引导为主线。引导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引导，也就是大统战格局的引导，这种格局的引导容易引起重视，并取得实效；一种是机制引导，主要是氛围引导、制度引导等，这种引导容易得到保证，且便于落实。政治引导是选拔、培养、使用无党派人士的基础，政治引导难易程度决定无党派外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的难易程度^[4]。

（五）以培养使用为重点加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

习近平强调，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4]。对无党派人士同样如此。我们要努力搭建平台，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实际和需要出发，以培养使用为重点。培养上，在《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指导下，统一战线要注意加强理论培训，增进政治共识；加强实践锻炼，着力提高素质；加强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挥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培养工作机制。使用上，把突出使用与锻炼有机结合，把工作安排与有针对性地提高素质有机结合，做到使用与锻炼、针对性与提高素质同步考虑、协调实施，促使其不断转化角色，拓宽工作领域，适应各种不同工作环境。加大推荐力度，提高推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努力做到人尽其才、用当其时。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无党派人士培养和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例如：培养力度不够、使用缺少平台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深入研究，下大力气加强和改进。

（六）以健全机制为支撑加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

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必须以健全机制为支撑，离开机制建设，一切无从谈起。其认定和队伍建设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机制：一是保留机制。要有意识地将一批优秀分子留在无党派人士队伍中。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大量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加入民主党派，这是无党派人士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织的重大贡献。但是，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新老交替和更新换代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有意识地保留一批优秀人才，作为骨干留在无党派人士队伍中。各级政协保留或设置“无党派人士”界别，作为建设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的重要基地^[5]。二是环境机制。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效应。加大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从环境上来说，就是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全社会关心，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三是选拔机制。结合实际，确定选拔重点。要将视角对准从事一线行政管理工作、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具有潜质的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优秀人才，通过科学评价，将他们选拔为党外后备干部进行培养。四是培养机制。培养机制包括培训机制和实践机制。通过培训机制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理论建设，提高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通过实践机制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践锻炼。近年来，许多地方建立了无党派人士挂职锻炼基地，成为其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五是使用机制。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使用，健全科学配备、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至关重要。因此，要将无党派人士的使用作为战略任务，在其使用的科学化、制度化上下功夫。六是监督机制。中共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该条例对中共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无党派人士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要牢固树立被监督的意识，自觉地接受组织和他人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和群众的信任。

（七）以能力建设为前提加强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6]。这五种能力对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同样有现实意义。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是衡量其认定和队伍建设质量高低的标准。只有以提高政治把握能力为前提，才能分辨出党外代表人士是否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政党制度；只有以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为前提，才能了解其是否敢参、会参、能参、善参情况；只有以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为前提，才可以明确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团结合作；只有以提高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为前提，才能知道其面对自身问题解决的能力与态度。因此，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一定要重视这五种能力建设，否则，其建设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无党派人士队伍五种能力建设是一道重要命题，需要我們进行深入研究。

总之，无党派人士认定和队伍建设是统一战线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规范认定、加强队伍建设，这项工作做好了，就为做好整个党外人士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0.
- [3] [5] 陈喜庆. 关于无党派人士的几个问题 [C] // 交流、研讨、谈心：从无党派人士关注的理论问题谈起，2009.
- [4] 樊笃涛，刘小莉，樊南希. 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
- [6] 习近平. 巩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J]. 中国统一战线，2015（6）.

责任编辑：张嘉瑶

谢子长对陕甘边地区统一战线的探索与经验

丁健 田怡曼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统一战线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边地区革命形势错综复杂,我党在该地区开展革命的进程举步维艰。以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密切联系广大农民群体、采用“借水养鱼”的方法开展兵运,不断坚持并加强党的组织队伍建设,书写了党在陕甘边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锦绣华章。在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我党在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不断扩大,这些探索为新时代下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积淀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谢子长 统一战线 陕甘边地区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29-06

谢子长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陕甘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陕甘边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谢子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光辉典范。在革命形势复杂的陕甘边地区,谢子长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除豪霸、振衰弱”^[1],并在各地持续开展兵运活动,直至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使党的红旗飘扬在陕北的高原上。在革命的大家庭中,谢子长关心爱护每一个同志,积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在错误思潮侵袭党的肌体健康时,他抛却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和革命事业为重,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贯彻于党内党外。陕甘边地区的革命之火之所以能够从“星星之火”变成“燎

原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持之以恒地开展革命斗争,创造性地实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谢子长领导陕甘边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实践

(一) 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谢子长出身农民家庭,自少时起,他就对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1924年末,为追寻革命真理,谢子长离开家乡安定县奔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下,他认识到,要彻底解放劳苦大众,就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推翻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2023年度统战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项目(2023HZ1275);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研究(24ZD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丁健,男,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田怡曼,女,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研究。

导,团结工农大众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走上革命道路后,万千农民群众是他首要联合的对象。1926年冬,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陕北籍学员霍世杰、冯文江等人回陕,与正在前线作战的谢子长不期而遇。他们向谢子长介绍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盛况,其中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还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思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由此,谢子长更加透彻地了解了关于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并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回到家乡创办农民协会,号召广大农民投身革命。

1927年,谢子长带兵驻扎在安定县,此处的国民党势力较为薄弱,而且群众基础较好,因而将此地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首选之地。谢子长带领群众斗税官、除恶霸,点燃了陕北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农民协会筹备前期,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发布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安定县农民协会章程》等文件,并通过了天足会、农民协会等八个决议案,深刻昭示了他整顿积弊、兴革地方之志。后谢子长向广大民众宣告:“中国共产党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大家更要不分男女老少切实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4]正是因为密切联系群众,谢子长才能一呼百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带领农民创办农民协会的过程中,谢子长身先士卒,带头去往栾家平村开展实地调查,向具有革命热情的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地主恶霸的压迫。是年3月20日,栾家平村口人潮如织,一个简易的台子被搭起来,台前贴着“东一区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横幅,左右两边贴着“全区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民协会,铲除剥削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标语,栾家平的农民协会成功组建。此后,各地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陕北的农民运动渐成

燎原之势。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昔日鱼肉乡里、欺压民众的恶霸宋应昌、白应奎等人被公开批斗,满写着“吃人”二字的黑心账本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谢子长以实际行动向广大群众昭示了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他一生为民奔走,直至负伤弥留之际,谢子长还心怀愧疚地说:“就这样死了太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5]

(二) 整合军事武装力量

陕甘地区各派势力盘踞,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乡野土匪、帮会势力等鱼龙混杂。1928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提出:“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严重的任务。”^[6]谢子长在党中央决议的指示下,结合自身的革命斗争实际,深刻总结清涧、渭华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下一步的革命工作,他认为“应该采取借水养鱼、借鸡下蛋的办法,打入白军和土匪中去,分化瓦解拉出一部分公开打红旗,使其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红军武装,然后结合农民运动,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到那时便能养鸡下蛋,蓄水养鱼……”^[7]由此,谢子长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其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锻炼下逐渐萌发。

1929年秋,陕北特委派谢子长、刘志丹到宁夏驻军骑兵苏雨生部做兵运工作。谢子长抓住其意图扩充个人力量的有利时机,率部进入苏雨生部。谢子长在陕北素有威名,苏雨生对谢子长的英雄事迹早有耳闻,他以“小庙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之情,款留刘志丹、谢子长,将谢子长与刘志丹所带人马编为一个旅,以谢子长为旅长,驻扎于银川北的李岗堡。谢子长随后就在其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军委,并组织了一个学兵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但实际上是和军阀讲统一战线,相互利用,相互发展,这就是采取统一战线的办法发展我们的力量”^[8]。

不久后,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谢子长与刘志丹为了保存部队实力,表面上接受了军阀

谭世麟的改编，实际上则利用在谭部的公开职务，收拢了一批躲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并争取、团结了当地的民团、哥老会等团体。然而，由于土匪张庭芝的破坏，在谭世麟部的兵运工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谢子长重整旗鼓，继续采用“借水养鱼”的方法扩大武装力量。1931年，谢子长根据党的指示来到了南梁，领导陕北游击队。由于部队人员构成复杂，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贫困农民，也有不少游民无产者、江湖镖客，因此，部队中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风气浓厚，组织纪律涣散，还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军需问题。部队驻防新堡期间，陇东军阀陈珪璋为对抗陕军而大力扩充实力，派人拉拢谢子长所在的队伍。谢子长与刘志丹两人考虑到部队面临的形势，认为可以挂名在陈珪璋部，以此解决部队军需问题，遂派人同陈珪璋谈判。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陈珪璋允诺给队伍提供相应的物资，谢子长率领部队暂时加入了陈珪璋的队伍。在祝贺收编大会会餐时，举行了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等人参加换帖活动，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哥老会是以宗族观念和江湖义气为精神支柱，拜把子、结金兰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维系手段”^[9]，谢子长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旧习，作为在队伍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策略。

（三）维护党内团结统一

加强党内团结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团结党内同志、同危害党的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更是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方面。正如刘志丹所提出的，“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要靠做人的工作。……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10]。1932年10月，攻打保安失利后，谢子长带领部队撤退到合水县平正川一带，部队缺衣少食，队员们士气低落。在凛冽的寒风中，谢子长将自己的被褥让给了伤病员，而自己只铺一个毛口袋，经常在夜晚被冻醒。在运送物资中，谢子长更是身先士卒，和留守人员一起运送粮食，并把好不容易筹到的衣物发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度过漫漫长夜。他

经常鼓舞士气低落的战友们，“满山的树春天绿，秋天又黄，有繁荣兴旺的日子，也有萧条枯黄的季节。我们干革命也一样，有胜利也有失败”^[11]。即使处于困境，谢子长也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革命的暂时失利。他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其他队员，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涨，大家靠在夜晚的篝火前唱起了陕北的信天游：

千果充饥带木瓜，游击队员拖不垮^[12]。

谢子长，计谋大，领着我们打天下。

冰天雪地咬紧牙，受点冷冻算个啥。

红军红旗迎风扬，来日方长还看咱。

谢子长在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恶劣的地理环境和凶狠的敌人，还经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侵扰。1932年12月，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游击队，此人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盲目追随者。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了党团员大会，杜衡在会上宣称“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并对谢子长等人采取的兵运活动和改造绿林武装的工作大加批驳，污蔑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的错误，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杨重远四人开除出部队，遣送他们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但谢子长并未就此丧失信心，而是从革命大局和党的利益出发，他坚定地认为：“革命就像一副担子挑在身上，职位越高担子越重，党叫担就尽力担。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咱也当然高兴呀！”^[13]在尽可能的争取协调下，刘志丹、杨重远二人得以留在部队，以此来保存建立不易的武装力量。谢子长将个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识大体、顾大局，一切从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出发，是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的坚定贯彻者。

二、谢子长领导陕甘边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群众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只有将群众工作做好，才能巩固党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进而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密切联系群

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是谢子长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陕甘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农民们处于“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艰难境地，加之地主的残酷剥削，更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1928年，佳县共有21639户，118374人口，而负担的‘正粮’即达17450.84斗，加上其他‘屯粮’、‘民地丁正银’等等，共合银元169430.17元，大人小孩每人平均负担1.5元”^[14]。因此，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谢子长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充分认识到了农民之于革命的重要性，所以致力于联合这一革命的主要力量。1927年，谢子长在安定县创办了农民协会，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针对农民群体最关心的问题，在《农民协会章程》的决议案中作出相关规定：“‘皮毛捐不得在活羊身上收款，如有违者归县署惩办’、‘差役不得向民众勒索’、‘粮差催户者不得苛索路程钱烟饭钱等’”^[15]，这些规定保障了群众的实际利益，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坚定支持。此外，谢子长也致力于维护民族的团结与统一。1932年3月，谢子长带领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进行革命斗争时，就发动当地的回民一起参与到打土豪、闹革命的活动中，同时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在建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时，更是邀请回民参加选举，使他们在政治上享有和汉族人民同等的权利，争取了许多的回民同胞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1934年末，以王世平、马彦林、孙长青等19位回民为骨干组建的回民武装，在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与其他游击队伍相互配合，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谢子长注重将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不仅为我党提供了坚实的力量来源，更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灵活运用。

（二）坚持政策的灵活性

谢子长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坚定维护党的领导，同时又能够从陕甘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面对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革命形势，刘志丹提出：“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

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16]谢子长也深谙要想我们党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更加广泛地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他主张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制定灵活多变的政策，积极争取政治倾向积极的哥老会等江湖团体，如1930年初，谢子长在陕北苏区组建农民武装队伍时，争取了哥老会主要成员李仲英，在李仲英的带领下吸纳了百余人加入革命队伍，极大地扩充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后期，我军被国民党军围剿断粮之时，李仲英亲自前往哥老会借粮，帮助红军渡过困难。而对待反革命分子，谢子长则坚决予以打击。“宜川围城”期间，土匪出身的五连连长雷进财预谋叛变投敌，谢子长亲自处决了这个叛徒。1934年9月，谢子长负伤期间还坚持指挥队伍攻打安定县城，消灭了作恶多端、危害人民的民团团总李丕成。此外，谢子长对待白军俘虏的政策更深刻体现了我党与旧式军队的区别。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带领部队在阳坡头作战中取得了首次胜利。按照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谢子长招待被俘士兵会餐，并亲自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关于革命的主张，对愿意参加红军的人员表示积极欢迎，其余人员则予以释放并分发路费。在后期的处理工作中，还主动救治伤俘、安葬敌尸，使得敌军人员深受感动，许多人都说：“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次被俘后，我们都估摸这下完了，没想到红军这样款待我们……”^[17]在谢子长的不懈努力下，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从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进步力量加入到了革命军队中。谢子长通过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略方针，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团结、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力量。谢子长、刘志丹两人所领导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堪称全国革命的典范，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加强党的组织队伍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于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现实需要，我党在扩充革命武装力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吸收、接纳了一些成分复杂的人

员,因此,我党初期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一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利于党的肌体健康。1932年1月,谢子长主持召开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这支队伍是由晋西游击队、保运武装与南梁游击队共同组成的,队员成分复杂,队内尚未建立起严明的组织纪律,且一些土客武装出身的队员难改旧日的不良习气,在群众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加强部队的组织建设,纠正队伍中的不良风气迫在眉睫。1月20日,根据省委指示,要“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18],谢子长与刘志丹开始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对这支队伍进行初步整训。谢子长通过深入研读《古田会议决议》,认识到部队中存在的两种不良思想——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部队风气和纪律。首先,在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于各大队、中队专门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并设立列宁室;其次,加强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抽调人员开办军事训练班,为战士们讲解中央红军游击战的战斗经验和部队工作的政治经验;再次,着重加强部队的群众纪律教育,对强抢群众的行为决不姑息,并为此拟定了纪律大纲;最后,谢子长十分注重维护军民关系和群众利益,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通过一系列的严格要求和组织建设,这支队伍逐渐成长,被人民群众所认可,为壮大红军队伍、巩固革命力量和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结语

谢子长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是为中国革命戎马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群众在贫瘠的黄土地上谱写了中国革命的辉煌篇章。谢子长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秉持着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的基本原则,将马克思主义

的统一战线理论同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形势相结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陕甘革命模式,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在克敌制胜、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 东平. 红都童话: (一) 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延安往事回忆 [J]. 党史博采 (纪实版), 2008 (6): 34-38.
- [2] [17] 张化民. 谢子长传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39, 146.
- [3]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63.
- [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谢子长纪念文集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558.
- [5] 叶滨. 子长负伤以后 [N]. 解放日报, 1946-03-01.
- [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4) (一九二八)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326.
- [7] [11] [12] [13] 强铁牛. 奠基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81, 259, 259-260, 266.
- [8] 张秀山. 我的八十五年 从西北到东北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155.
- [9] 任学岭, 康小怀. 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69-78.
- [10] 习仲勋, 马文瑞. 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95 周年 [N]. 人民日报, 1998-10-18.
- [14] 星光, 张扬.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
-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谢子长纪念文集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558, 548-556.
- [16]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 刘志丹纪念文集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760.
-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姚文琦. 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一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249.

责任编辑: 张嘉瑶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基础

张嘉瑶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立足中国具体革命实践，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梳理总结这一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科学认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毛泽东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4) 02-0054-06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1]。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充分把握统战工作的策略原则，立足中华民族存亡之根本，推动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基础，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以中国具体国情为依据，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价值的契合性。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逻辑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统治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统治，全世界无产者都面临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不单单仅限于一个国家内部，也包括了不同国家间的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是为了寻求阶级内部的最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波兰》中指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

收稿日期：2024-06-15

作者简介：张嘉瑶，女，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统一战线理论。

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2]，强调要加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联合。

二是无产阶级要努力结成阶级间的联盟，即最大限度地寻求同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同盟，强调要联合其他同盟军的问题。首先是与农民阶级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认为农民与无产阶级均受到资本的剥削，只是剥削形式不同，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这就成为形成两个阶级联盟的一大基础，革命的现实发展也更进一步凸显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凸显了农民阶级的力量。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再一次强调要有农民力量的支持，否则是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其次必须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察觉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3]。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4]。

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认清自己的阶级立场，绝不能模糊自己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避免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去附和它。相反，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应当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二）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联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击资本的进

攻。二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列宁将统一战线的视角扩展到了东方世界，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在目前只能进行民族革命，并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三是争取同盟军的力量。首先是农民，他们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1909 年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中就指出“在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强调必须同农民采取共同的行动。1921 年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讲到“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摆脱像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样的祸害，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奇怪的矛盾，即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被财富噎得要死，而地球上广大的居民却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明和利用那些由于流通不畅而没有出路的丰富资源”^[6]。

除了农民，列宁还指出“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7]。同时还明确了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除此以外，列宁还强调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这也是争取同盟的方式之一，是在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对立进行分化瓦解，进而为自己争取一定条件下，间接的、暂时的同盟力量。

列宁也明确了领导权的问题，指出“社会

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8]。

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正确科学的分析,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文化逻辑

(一)“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正是基于中国具体实践,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管仲“和合故能谐”(《管子·兵法》),孔子“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篇》)等等,主张的就是寻求多样性的和谐,承认并尊重差异性。“和合”体现的是一种不同事物之间连接的状态、关系,可以说无论是人际关系、社会发展还是天地万物的发展都要遵循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彼此相互包容、相互接纳、相互融洽的法则。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统一战线理论之中,正确把握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彰显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具有广泛的民族性特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辩证处理了“同”与“不同”的关系。在面对国民党实行专制主义并开展反共摩擦活动时,在面对有人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时,在党内存在有“左”和右的倾向逐

渐发展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毛泽东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提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确立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妥当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问题,坚决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立场,有力地巩固和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二)“大一统”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孟子“(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以“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为前提的“大一统”思想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周王朝实现了天下共主的“大一统”;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六国,建立了郡县制,实现了在地理、政治、文化、制度上的统一,最大限度的消除了诸国异制的现象,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构了“大一统”的格局。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统一与分裂反复,但历代王朝始终将“大一统”作为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的目标。清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了“中外一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一体观念,雍正更是在《大义觉迷录》中直指华夷之辨,批驳是“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訕谤诋讥之说耳”^[9],随着“大一统”思想的成熟发展,行为实践也在平定叛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方面得到体现。统一战线汲取了“大一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基因,剔除了其带有封建专制的色彩,立足于人民立场,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服务于祖国的完全统一。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刻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就是呼吁一切可能的力量联合起来,不做亡国奴。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就强调“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

（三）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之一,《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更是总结了桀、纣之所以失天下的历史教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有关君和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礼记·缙衣》有云“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的君为舟、民为水,《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中君为枝叶、民为根,都突出强调了民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史为鉴,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的观点。虽然民本思想是以民为核心,强调统治者要重视民的作用、民的力量、民的呼声,不能“刻民”而要爱民、利民、富民、施惠于民,但其本身又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局限性,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驭民的一种方式或工具。毛泽东则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做了扬弃,批判性地继承、创新性地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阐释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为人民服务,真正赋予人民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个人权利和意愿,打破了封建统治之下的地位对立和剥削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强调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共产党都与之联合”^[12],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3],充分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汲取强大的革命力量、统战力量。

三、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形势发展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逻辑

（一）早期实践探索的经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了同盟军力量的重要性,故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

的主张,同时规定了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大革命后期出现了右倾错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压制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放弃了党的领导权,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也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即要坚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要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要坚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所带来的惨痛经历,党内一度充斥着“左”倾错误思想,强调革命的动力只包括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片面强调纯洁革命队伍的问题,缺乏对社会不同阶级性质的正确认识分析,“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其他党派也不加区别地视为敌人,把邓演达、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等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奸细’”^[14],结果失去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使得工农联盟被孤立,统一战线发展受到局限,革命再次遭受损失。由于“左”倾错误的全面推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广泛争取地方实力派,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争取合作。

（二）现实发展的实践要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运动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出现新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15],为了进一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针对不适应目前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作出调整。1936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12月西安事变爆发,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党中央立足根本,从大局出发,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推

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准备了前提。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16],具有广泛的民族性特点。

从国际形势看,抗日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深。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7]“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18]可以看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是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的,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广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也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四、结语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导向,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成熟,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团结,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法宝作用。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不断迈进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了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看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国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因此,学习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统一战线的科学理论,汲取新时代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需的智慧和经验,深刻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411-41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25.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591.
- [5] 列宁. 列宁全集: 第1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63.
- [6] 列宁. 列宁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33.
- [7]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48.
- [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1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92.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清史资料: 第四辑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 [10] [12] [13]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 61, 59, 62, 43.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 [1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2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33.
-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 第11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01.
- [17] [1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77, 178.

责任编辑: 马文婷

新时代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 价值取向、基本经验与提升路径

刘宽忍¹ 李正升¹ 屈三成¹ 张秋菊¹ 黄斌² 郭宪洲¹

(1. 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 陕西 西安 710061; 2. 西安财经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新时代以来, 民进在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了有助于民进作风建设长期坚持的价值取向、基本经验和实践路径。其价值取向可以归纳总结为以党为师、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 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和坚持服务为本、清正廉洁等四个方面; 基本经验主要表现为夯实思想根基、加强自身修养、优化工作作风、加强干部作风和健全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 提升路径需要从以党为师持续做好学习借鉴工作、坚定不移强化参政意识、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紧抓关键少数和驰而不息推动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系统推进。

关键词: 新时代 民进 以党为师 作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34-05

作风作为政党政治理念、政治立场与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是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规范言行、体现形象和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民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自成立之日起, 就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人间正道, 坚持以党为师, 扎实推进自身的作风建设。新时代以来, 民进在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 围绕“以党为师、从严治会”长效机制建设形成的价值取向、基本经验和实践路径, 为民进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新时代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一个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内在使命的集中体现, 内在的规定了该党的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 2023 年度重点课题“以党为师,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对民主党派的启示”优秀课题成果。

作者简介: 刘宽忍, 男, 教授, 民进中央副主席,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 研究方向: 参政党理论; 李正升, 男, 陕西省人大常委, 民进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 研究方向: 参政党理论; 屈三成, 男, 陕西省政协常委, 民进陕西省委会秘书长, 研究方向: 参政党理论; 张秋菊, 女, 民进陕西省委会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 参政党理论; 黄斌, 男, 教授, 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郭宪洲, 男, 民进陕西省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 参政党理论。

行为方向和实践路径,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民进高洁而鲜明的价值取向,发端于创始人的高尚风范,规范于民进会章所确定的“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根本政治原则^[1],体现于民进“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服务为本”的广泛共识。结合中共中央对参政党建设作风优良的要求,可将新时代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价值取向归纳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党为师,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也是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奋斗中成长起来的。民进自身的使命和发展紧紧地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以党为师,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自觉选择的政治立场和老一辈的政治嘱托,也是全体民进人的政治财富。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先生留下平生最后一幅题词:“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2]已故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也强调,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的光荣传统和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3]。

二是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民进是马叙伦、王绍鏊等爱国的民主人士在革命烽火中成立的。早在民进成立之前,民进创始人就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站在人民的立场,主张团结、民主。可以说,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是民进人的思想基础、精神基因和心灵家园,也是激励民进人积极履职尽责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在动力。今天,爱国、民主、团结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求实是对民进爱国、民主、团结等政治理念、政治原则和具体要求在民进组织原则、各项制度和各种作风具体落实的要求,也是民进人踏实肯干、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的

体现。

三是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立会为公是民进会章确定的根本政治原则,参政为民是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基本要求。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是民进的高尚风范和行为准则。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民进等各民主党派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参政党,共同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政治格局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民进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是民进进行自身建设和履职活动的目的,也是民进会员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四是坚持服务为本、清正廉洁。服务为本这是民进作为参政党,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服务社会的职能,是民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政治立场的具体体现。清正廉洁是新时代中共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核心价值观取向,也是民进按照“八项规定”精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准则和民进优良传统对每名会员、每个干部加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党为师,从严治会,需要严守会内政治生活准则,严格纪律要求,营造求真务实、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干部规范行为、廉洁从政、清廉做事。

二、以党为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对民进作风建设的启示

新时代以来,民进通过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在生活作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组织作风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在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修养、优化工作作风、加强干部作风和健全制度保障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扎实推进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 在夯实根基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

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将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作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4]以人民为中心,也是民进作风建设的光荣传统。新时代以来,民进始终坚持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倾听人民呼声,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利民务实行动,坚持弘扬传统,坚持不辱使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充分保障民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 在思想作风上,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根基

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政治问题。抓作风建设必须“讲党性”,抓住党性修养这个关键点,在“根”和“魂”上下功夫,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就是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全体党员以理想信念涵育道德情操,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政治定力,补足思想之“钙”;通过学习党章、遵守党章,增强党员意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彰显以身许党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5]。民进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不仅参与和学习了中共中央开展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也通过全面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使全体会员更加深刻地理解和领悟修订会章、学习会章和遵守

会章的历史必然性、实践意义和精神实质。

(三) 在工作作风上,把驰而不息纠“四风”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

新时代以来,“四风”问题已经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四风”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反复性,也决定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共中央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治作风与治腐败相结合的系统性思维方法,制定党内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努力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民进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理念、经验和实践为引领,坚持“严”字当头、筑牢底线,自觉将“八项规定”和反“四风”作为制度红线,推进成立内部监督委员会、印发《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增强按程序、按制度办事的原则要求,不断改进学风、文风、会风,以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推进全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 在干部作风上,把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

作风建设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对所在单位和地区的作风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牢牢扭住领导干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领导干部守住道德底线,将党章党规党纪作为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的价值准绳,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务实高效,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新时代以来,民进把领导班子作风建设作为全会作风建设的重点,注重发挥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规范召开民主生活会、述职和民主评议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以上率下,注重言行表现和以身作则,强化法纪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切实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引领带动作用。

(五) 在保障机制上,把制度建设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保障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是关键。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制度建设摆在作风建设的突出位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努力形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成为管党治党、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的重要举措^[6]。民进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依法依规办事能力建设,先后制定了《民进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民进自身建设的意见》《民进中央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民进中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以及18项各类工作条例等指导全会作风建设的文件,构建了系统较为完备的民进作风建设制度体系,全面提高了民进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三、新时代新阶段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提升路径

新时代是民进成立以来,以党为师,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影响最大,取得成就最为明显的历史时期。但目前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有待加强、章程遵守不够认真、保障制度建设有待增强、组织内部监督需要继续完善等诸多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民进作风建设,需要结合新时代民进作风建设的历史使命、价值取向和基本经验,根据参政党优良作风建设要求,探寻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的提升路径。

(一) 以党为师持续做好学习借鉴工作,大力传承民进优良作风

民进老一辈领导者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和火热的建设实践中展现出了心系家国、不畏强权、投身复兴、舍生忘死的高贵品格与崇高风范,是民进必须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党为公,始终是民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时代民进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新时代新征程民进以党为师加强作风建设,既要深刻感悟民进老一辈领导人与党同心、携手前行的坚定政治信念,继承弘扬民进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优良传统;也要秉承“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深刻理解“三个坚持”对作风建设的政治要求^[7];还要认真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自觉把作风建设与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相结合,通过驰而不息抓“四风”问题,塑造民进人“四新”“三好”新的时代形象。

(二) 坚定不移强化参政党意识,握紧民进从严治会作风建设的核心

参政党意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中,处于参政党地位的民主党派对其参政党角色及其参政党活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和把握^[8]。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是民进参政党意识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支撑,是民进作为参政党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根据参政党优良作风建设要求,加强和改进民进工作作风,需要立足参政党性质、地位和职责使命,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立场,把民主、团结、务实、清廉的作风,体现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开展社会服务和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之中。民进会员要立足“服务为本、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和时代要求,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三) 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夯实民进作风建设基础

思想建设是作风建设的基础,没有持之以恒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使命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民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一是全面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结合“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的主题教育,强化会员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三是加强自我教育。严格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三严三实”精神,大力弘扬清风正气。大力加强会史教育,深化多党合作政治共识,充分发挥好民进会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政育人作用。

(四) 坚持不懈紧抓关键少数,切实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代表性强、品行良好、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是民进自身建设中一项长期而紧迫的战略性任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四新”“三好”要求,落实“三个文件”“五个纪要”精神,把组织建设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作为“源头工程”“基础工程”来抓。一是突出严于律己。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严格自律,更要在个人日常生活中树立正确的家国情怀,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抵御各种腐蚀诱惑。二是增强自觉意识。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务必躬身践行,将思想化为具体行动,发挥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真正成为优良党风的引领者、示范者、推动者、实践者。三是严格落实“五个纪要”精神,始终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建设,努力让民进人在扎实肯干中创造经得起党和人民检验的实干业绩。

(五) 驰而不息推动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持续推进民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作风建设之所以会出现常抓常犯、屡禁不止

情况,制度化不足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新时代新阶段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当务之急。一是坚持方向性原则。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使民进的作风制度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相适应。二是制定专项规章制度。当前,民进关于作风建设的规定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以及党派章程等规范性文件,有必要结合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习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和纪律作风等不同领域的特殊性,制定内容更加具体详实的规范,细化作风建设要求。三是建立健全廉政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丰富监督手段,强化执纪监督,不断推进民进作风建设走细走深走实。

【参考文献】

- [1]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M]. 2022: 1.
- [2] 马今. 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我的祖父马叙伦[J]. 民主, 2021(5): 39.
- [3] 严隽琪. 不忘初心 同舟共进[J]. 民主, 2016(8): 1.
- [4] 习近平.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24.
- [5]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J]. 党建, 2018(7): 1+8.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578.
- [7] 蔡达峰. 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加强民进作风建设[J]. 民主, 2023(3): 4-6.
- [8] 王俊华. 新时代参政党作风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向度[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6): 52-57.

责任编辑: 蒙晓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审思

杨建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摘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教育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然之需,亦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篇章。当前,错误思潮、邻避冲突、多元文化等冲击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消解态势,亟须发挥中华文化“向内凝聚”作用,打造内敛、内嵌、内合、内修、内化“五位一体”教育矩阵,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且长效融入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为学生成长成才增质赋能。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39-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上,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章程。2019年,习近平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1]”。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着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2]这些部署要求,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从宏观探索走向具体实践。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在高校铸牢大学生群体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追问与探究。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需在教育现代化转型升级中寻找育人契机,搭建育人载体,将中华民族熔铸为坚不可摧的共同体,获取高质量发展新的更大动能。高校要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既传承经典又面向时代,既根植民族特色又彰显世界文明,在“起承转合”逻辑理路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铸牢“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人的本质是真正的共同体。”^[3]马克思认为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202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课题“抗疫精神融入医药类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多维路径研究”(2021SJB09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建,男,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洪泽湖产业学院教育管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体”必将经历“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演进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将“个体的联合”延伸到“民族的联合”，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各族人民体会到了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精神的意义和价值。”^[4]抗疫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现实依据，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疫斗争中得到空前强化。实践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每经历一次苦难，都会推动着民族意志、中国精神、共同体意识不断淬炼、涵育与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共同体思想中的精髓要义，锻造于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化民族理论的前进理路，确定于应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时势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化认同”过程，是全党追求的共同意志和遵循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一是提高认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二是增强认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其精髓在于增进“五个认同”，即要不断培育各民族同胞的家国情怀，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华文化的精神要义和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抉择与优势。三是自觉行动。这是基于认知和认同上的更高层次的体现，表征为积极主动的情感态度和思想意识，外化为各民族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行动。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工程，在高校“大党建”

“大思政”育人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面临以下挑战。

（一）错误思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削弱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加上其思考问题不成熟、不全面，特别容易受到“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不良信息泛滥的自媒体时代，因主流文化、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的不同，大学生面临着如何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面临着境外势力跨国意识形态渗透问题，面临着境内外不同文化碰撞而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一旦无法明辨是非，必将导致其理想信念淡化、弱化甚至歪曲我国的优秀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不利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以及“共同体”理念的践行。

（二）邻避冲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遮蔽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的占比相对较小，这就导致其“被关照”心理扭曲，人际交往存在障碍。民族生由于从小受民族文化熏陶和家庭生活影响，具有特有的民族习惯、学习方式、生活法则，与其他同学相处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加上民族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较弱，害怕“被欺负”的心理隔阂，这些从侧面加重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抱团取暖”现象。邻避冲突主要表现为信任困境、参与困境和发展困境，其本身是一种离心力，是古代“以邻为壑”思想的现代延续，如果高校没有行之有效的“大思政”育人举措，没有执行有力的“同心圆”“石榴籽”等实践教育，容易消解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共同体理念。

（三）多元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冲击

多元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比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

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等。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居住着五十多个民族,加上诸多的跨国民族的存在,这导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而出现认同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6]民族文化虽各有差异、独立性,但彼此并不排斥,而是相互吸引、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非排他性的话语表达,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在公共价值诉求上所具有的共通性和一致性,有助于大学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和谐共生。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 内敛: 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格局

“吸引”方能“影响”,自身文化是否经典、是否有魅力,关键在于自身“硬实力”。因此,提高文化吸引力与传播力,是促进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发挥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以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共同构建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高校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工作思路,要着眼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入学校党政工作要点中,落实到重大项目和具体行动中。同时,各二级单位要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一线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确保把党的民族政策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学生听得懂、理得顺,形成全员参与、全域贯穿、全程覆盖的工作格局。此外,高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升人才梯队的质量和水平,造就和培养一大批叫得响、立得住、推得开“共同体意识”的宣讲者、阐释者和弘扬者。

(二) 内嵌: 形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范式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7]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铸就了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融会贯通、百花齐放、多轨并行的可能性。促进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融通,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各族人民互动、互融、互嵌、互鉴、互促的价值要求。为此,高校要积极营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育人环境,在校园软硬件建设方面做足文章,春风化雨般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是校园硬件设施建设。高校应将中华文化符号、形象标识、理想追求等各民族共同价值有机嵌入图书馆、办公楼、校史馆、人文景观、教育基地等硬件设施中,使其成为“会说话”的生动教材。二是校园软文化建设。学会挖掘和提炼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基因,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校训、校风、学风、教风、育人理念等校园软文化建设中,着力营造浓厚育人氛围。

(三) 内合: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体系

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8]”。其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注重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育人功能,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向文化“借力”,向认同“发力”。一是,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一批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且融合世界文明成果的校本教材、艺术佳作和文创作品等,引导大学生在文化浸润中获得情感体验和文化认同。二是建设同心教育实践基地。学校要依托专业特色,充分挖掘整合校内外统一战线教育资源,创新培育集思想引领、联谊交流、建言资政、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五位一体”的同

心教育实践基地,在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上下功夫,塑造崇高人格和民族精神品格,提升民族文化的认同。

(四)内修:编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秩序网络

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当前以元宇宙、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进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因此,“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9]要组织推进“互联网+民族团结”行动,把互联网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联场域。一是抓实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线下举办共同体意识主题系列教育,线上开展共同体意识“云课堂”教学,实现二者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做好线下与线上的融合文章。二是构建立体多维教育体系。运用智能化手段推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充分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媒体平台,进行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地宣传,推介“共同体”文化。三是打造沉浸体验教育模式。随着VR、AR、AI等技术日渐成熟,虚拟仿真实验室、一站式智慧中心、元宇宙社区已成为高校教育争夺的重要载体,为开展育人育心工作提供更具场景化、代入感的体验与感悟。

(五)内化: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教育

教育旨在使学生把自己所认同的新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贯通在一起,转化为自觉行动。“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因此,创造性转化非常关键,转化才能共有,只有通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转化,才能不断促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

是纳入实践主题教育。在干部培训、爱国教育、社区宣讲、社团活动、文化交流、调查研究等实践环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教育活动。二是开展实践场景教学。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纪念馆、社会实践基地等场所,组织邀请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援疆援藏干部等开展场景式教学,向大学生群体宣讲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三是加强实践互动交流。抓住夏令营、“青马工程”“暖冬行动”等团学工作品牌,组织大学生群体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考察、学习和交流,通过“多元一体”同心教育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l/2019/0928/c1024-31377932.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l/2019/0928/c1024-31377932.html).
- [2]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金句[J].民族论坛,2021(3):123.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3.
- [4] 战“疫”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1):6-11.
- [5]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 [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7]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N].光明日报,2019-05-16(02).
- [8] 詹小美.民族文化认同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1.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

责任编辑:李蕾

《诗经》所见褒姒形象及其评价问题

——以《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大雅·瞻印》为考察对象

陈思瑞 白俊生

(汉中市社会主义学校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诗经》中的《小雅·正月》《大雅·瞻印》等诗篇以批评为主的感情基调将西周的灭亡与褒姒挂钩。而这种自《诗经》开始建构的褒姒“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形象及批评,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褒姒参与了西周末年王室政争的历史事实,又因周人将矛盾的焦点汇集到褒姒身上,恰恰掩盖了两周因革之际,周人内部姬、姜两姓贵族权力之争的实情。而褒姒作为幽王一方失势的代表,在随后礼乐文化系统中被塑造成了导致宗周覆亡的罪魁祸首,又因《诗经》的经典性而使“褒姒祸国”的形象不断被强化和刻板化。

关键词:褒姒 《诗经》 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43-06

《诗经》作为“六经”乃至“十三经”之一,在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故其诗篇所载人和事的可信度也是极其高的,无怪乎清人崔述著《考信录》仍以“考信于六艺”为旨归和标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1]。正因为《诗经》的权威性和经典地位,其中涉及评价褒姒的篇目,如《小雅·正月》《大雅·瞻印》的诗句似乎成了西周以来“女祸论”的源头。而《小雅·十月之交》的“艳妻”,也与褒姒密切相关。总之,“在《诗经》的影响下,从《国语》《左传》直到《史记》,逐步建构起了‘褒姒灭周’的史学与文学文本体系”^[2]。然而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颇为复杂,《诗经》的记

载和评价并不能成为定谳,仍有进一步发掘和探索的空间。

一、《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大雅·瞻印》所见褒姒形象书写

(一)《小雅·正月》直陈褒姒之过

《正月》以“繁霜”起兴,引出“民之讹言”,进而两相类比,将诗人对时局的担心,深切巨大的痛苦忧愁以至于生病的情形烘托出来,足见其担忧之重^[3]。

此诗中“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一“灭”字,是周人对褒姒倾国的直接控诉,犹如《春秋》一字褒贬,不可谓不重。关于《正月》的诗旨,《毛传》曰“大夫刺幽王也……有褒国

收稿日期: 2024-06-15

作者简介: 陈思瑞,女,汉中市社会主义学校助理讲师,研究方向: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白俊生,男,汉中市社会主义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统一战线政策理论。

之女，幽王惑焉，而以为后，诗人知其必灭周也”^[4]，朱熹《诗集传》则提出另一说：“此东迁后诗也。时宗周已灭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监戒之意，而无忧惧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虑其将然之词。”^[5]他指出了这种后来追述纪事的可能性，高亨《诗经今注》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然而根据诗文内容来看，诗人是以“忧”为全篇抒情基调的，岂可谓“无忧惧之情”？故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毛诗会笺》反驳道：“褒姒倾国，宠臣成党，谗胜国残，大命将摯，是诗所忧正在此，序谓大夫刺幽王，是诗中明有褒姒，而《集传》犹疑之，以为东迁以后诗，谓‘时宗周已灭矣’，不知此诗刺时也，非感旧也。若褒姒已往，镐京已亡，言之亦复何益？与前后文意皆不类矣。”^[6]我们赞成这个观点，《正月》关心民生，忧虑国家前途，控诉褒姒对周王朝政局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至少说明诗歌创作的背景是为讽刺时弊而作的。而诗人还对民间舆论态势非常重视，即“民之讹言”“好言自口，莠言自口”，重视民意对周王朝的态度，《国语·郑语》也有“檠弧箕服，实亡周国”的说法，这种民间谣谚，固然是当时人们对褒姒祸国的反对之声，然亦有可能是史家事后追溯之辞，类似倒叙的手法，而此处对“赫赫宗周”与褒姒的关系，则与之有一定的差异，应是根据褒姒参与现实政治及其影响而作出的推测。总体而言，这类诗歌现实指向明显，诚如夏保国先生所言：“社会混乱也表现在谗言其兴、忠言难进的舆论阻塞和舆论混乱之上，加剧了对败亡的主观感受……《诗序》多言这类诗篇为‘大夫刺幽王’之作，可见忧惧和思索这种社会危机而提出谏诤的卿大夫不乏其人。”^[7]

（二）《十月之交》权臣、后妃“艳妻”与政局动荡

全诗前三章以“日食”起兴，并历述雷电、地震、山崩等大灾害，将“日月告凶”和“四国无政”对应，以灾异谴告的天人感应模式引

出民生多难、国运维艰的现实。

造成西周末年政局动荡的因素，《十月之交》第四章有完整的交待，盖因此章点出了扰乱时局的政治势力分别是皇父、番、家伯、仲允、聚子、蹇、橘、艳妻。《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评论曰：“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阳之原也。”^[8]也即是说“言褒姒与上七人都是红人，并居显位……这章说小人居位，艳妻受宠，他们主宰国家的大事”^[9]。对于“艳妻”的理解，《诗小序》主幽王说，郑笺则主厉王时期，然郑玄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言妻党盛，女谒行之甚也”^[10]，胡承珙以《十月之交》所反映的“川沸山崩”的自然灾害为周幽王时的史事，并驳斥厉王时期无皇父等七人，且“山川之祸，女戎之论在厉王时更无影响可寻，故郑笺以为厉王，并未能质言所据”^[11]。胡氏赞成幽王褒姒之说，疑郑玄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高亨在解释“艳妻”时即指出：“艳妻，指幽王的宠妃褒姒。此句指褒姒处于幽王左右，从旁吹风鼓动幽王干坏事。一说：言褒姒是如火般炽盛的红人，处于幽王的左右。”^[12]而这种写法更有其高明之处，赵逵夫先生指出：“诗中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焉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昏庸的周幽王。”^[13]与后世“《春秋》为尊者讳”^[14]的史家笔法近似，既然点出来“艳妻”褒姒，其背后王权代表的幽王也就呼之欲出了。

正因为幽王时期宠妻与权臣把持朝堂大权，其时政策多违背民意，给平民生活带来灾难，招致人们的反感，权臣皇父等人打着礼制的幌子中饱私囊、干扰农时、抢夺民财。非但如此，其还掠夺王室的人才、将财富迁往自己筑造的大城里。因而诗人立足现实，特意关注到了内宠、权臣把持朝政下的舆论情况——“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

由人”，此即说致力于王事的人们，不敢领受自己的功劳，没有罪愆和过错的人，还要防备众口铄金的诽谤气焰。由此来看，诗人彻底展开对现实的批判，天下百姓遭此大难，不是因为上天降灾，而是因为权臣、艳妻等人贪鄙腐败，破坏政治、经济秩序而造成人祸所致。贪鄙小人当面相合背后憎恶，都是由这类主从竞相为恶的人造成的^[15]。

（三）“哲妇”与国家兴亡

《大雅·瞻卬》与直接指陈褒姒不同，全诗主要立足对“哲妇”的批判，这种价值评判立足于性别差异，与《尚书·牧誓》的“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近似，而这在西周末年可能更成系统，如《国语·郑语》批评幽王“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16]，然考其实，并无多少科学性可言。

《大雅·瞻卬》通过社会混乱、财产占有、民众舆论、女性分工与职能等方面批评“哲妇”对现实政治的败坏。其中，诗人立足天人关系和民众舆论视角加以批评，“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蠹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社会十分混乱，毫无安定之感；又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脱）之”，已经达到滥用刑罚、倒行逆施的程度，还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直指褒姒乱政^[17]。这集中反映在此诗的第三章中，邵炳军先生对此有过分析可以参看：

首两句对举而言，前者谓周王承始祖恩德以立国，后者谓后妃却使皇祖基业倾覆了，亦即宗周覆灭了；中间两句“泉”“鸱”连文为义，均承上文比喻“哲妇”——“泉”之“不孝”，“鸱”之“恶声”，“妇”之“倾城（国）”，正是诗人以隐喻方式寄寓象征意义之处；结尾六句回答了“哲妇”何以“倾国”与“泉鸱”何以喻“哲妇”的原因。诗人以“泉”“鸱”两个

客观物象与“哲妇”以判断句式构成了一组客观事象，构成“赋象”——直接陈述“倾城”之“哲妇”就是“泉”“鸱”；又以“比体”构成“比象”——以恶鸟明喻恶妇，“哲妇”为本体，“泉”“鸱”为喻体，采用比喻方式，以“泉”“鸱”象征“哲妇”，非常形象地揭示出“哲妇倾城”之旨^[18]。

对于此诗大旨，《毛诗序》言此诗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朱熹则详细剖析道，“言男子正位乎外，为国家之主，故有知则能立国。妇人以无非无仪为善，无所事哲，哲则适以覆国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妇，而反为泉鸱，盖以其多言而能为祸乱之梯也。若是，则乱岂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说哉？特由此妇人而已。盖其言虽多，而非有教诲之益者，是惟妇人与奄人耳，岂可近哉！上文但言妇人之祸，末句兼以奄人为言，盖二者常相倚而为奸，不可不并以为戒也。欧阳公常言，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其言尤为深切。有国家者，可不戒哉！”^[19]诗人于此主要以恶鸟、恶德、恶声譬喻在周王朝发声的褒姒，以此批评她给王朝带来的政治动荡。而褒姒在周朝政局中应当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从后来的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中太子宜臼和伯盘废立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故诗人本意在于反对作为“哲妇”的褒姒出言干政。

当然，作为西周剧变历史中的人物褒姒，其覆灭宗周的评价背后更有深刻的原因。马银琴先生认为，《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评价表象背后，“掩藏了当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20]”。这种矛盾源于姬、姜两姓的政治联盟在幽王时遭受到挑战。“幽王之时，（姜姓）西申的势力与影响更加强大。在母舅申侯支持下的太子宜臼与幽王之间的父子对立，实质上代表了周王室政权结构中姜姓诸侯与姬姓诸侯政治力量的对立。由此而言，幽王之废申后、立褒姒，不仅仅是对一个女子的冷落和对另一个女子的宠爱。废宜臼而立伯服为太子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嫡庶太子之争。更重要的是，

这件事意味着以幽王为代表的姬姓政权力量对以申侯为代表的姜姓诸侯政治势力的打击。”^[21]而褒姒站在台前代表幽王与姜姓诸侯势力对抗，源于他们拥有共同的政敌和各自的利益诉求^[22]，如褒姒被册立为王后，其子伯盘成为太子，至少在这个层面，她切实地参与到了这场权力之争当中。

二、出土文献所见褒姒与西周灭亡问题

除了传世的《诗经》《国语》等文献之外，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以及近些年出土的清华简《系年》皆对西周末年褒姒史事有过记载，而且其中大部分史事是能够互相印证的。

清华简（貳）《系年》简5—7曰：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坪（平）王。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生白（伯）盘。孚（褒）姒辟（嬖）于王。王与伯盘达（逐）坪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缙）人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滅，周乃亡^[23]。此部分作者以简练的笔法叙述周幽王时期娶褒姒、立伯盘，废黜申后、太子宜臼以及随之而来的周王与西申、缙等冲突及西周的灭亡。

古代文献中保留了此段史事的片段，如：《国语·郑语》在记叙褒姒近乎妖魔化的出生后，详细记载褒姒受宠及西申、缙、西戎强大是现实并点出周与西申等的矛盾会导致王室覆亡。褒人褒姒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申、缙、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缙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24]

《国语·晋语一》则非常简要地叙述褒姒受宠、废黜太子改立伯盘，西申、缙人联合西戎覆

灭西周的过程。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鄩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25]。

同时，西晋出土文献古本《竹书纪年》也有与简文近似的记载。《太平御览》卷147 皇亲部十三引《纪年》：“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太平御览》卷85 皇王部十引《纪年》：“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盘 [服]，以为太子。”^[26]《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纪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

当周幽王向西申逼迫其交出废太子宜臼时，自然招致了太子母族申人的反对。申作为姜姓诸侯国，在西周晚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宣王就把自己的舅舅分封到南阳，《大雅·崧高》盛赞“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可见一斑。而留在西土的西申也是姜姓诸侯之一，申侯之女能被幽王立为后，也可见西申的影响力之强。而褒姒的出现，正好处在了姬姓与姜姓的权力之争的漩涡中。^[27]此时申后、太子宜臼被废，褒姒及其子伯盘成为了直接受益人，无疑充当了以幽王为首的姬姓贵族的代理人，当然其中也有姒姓贵族的影响在内。因此，当幽王向西申施压捉拿宜臼时，清华简《系年》简文则记载“申人弗畀，曾（缙）人降西戎”，《国语》则分别记载为“缙与西戎会”“鄩人召西戎”，两种文献记载略有差异，但大都不离缙人勾连西戎伐周覆灭幽王及伯盘的史实。正因为申后、宜臼与幽王、褒姒、伯盘的对立涉及姬、姜两姓贵族势力之争，故在幽王、伯盘及褒姒被消灭后，晋、鲁、郑、卫、虢等姬姓诸侯并未立即拥立平王宜臼，而是扶植幽王之弟余臣，及至晋文侯支持平王，杀携惠王后，方才让平王定鼎成周。

对此，清华简（貳）《系年》简7—9记载道：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诸）侯焉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

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2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此段史事有概括性的评论，“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29]。《左传正义》引《汲冢书纪年》记载更为系统，“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30]”。也即是说，姬、姜两姓贵族的权力之争并未伴随着幽王、褒姒、伯服的覆亡而终止，由此可见这两大族群的较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三、《诗经》褒姒形象建构析论

从《诗经》之《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大雅·瞻卬》诸篇所见褒姒书写来看，基本是以批评为主的感情基调出现的，且多将西周的灭亡与褒姒挂钩。当然，也不乏像《小雅·十月之交》借批评褒姒来批判其背后的周幽王的诗作。可以说，自《诗经》开始就建构了褒姒“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形象。而在这种“女祸”形象的背后，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褒姒形象的建构与宜臼、伯盘及其代表的姬、姜两姓贵族政治斗争紧密相关。在这场贵族间的权力斗争中，太子宜臼取得最终胜利，而作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形象书写大多不会太积极正面。马银琴即通过对《小雅·正月》的考察认为，当时民间将《国语·郑语》中史伯叙述当时民间的褒姒出生近乎妖魔化的“讹言”，具有打击政敌的作用，而这更在平王胜出后被认定为“真实”的历史^[31]。

其二，《诗经》的形成体现了周王朝的文化意志，蕴含着对人物的臧否褒贬。《国语·周语》载有邵穆公所论天子“听政”即涉及“诗”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

而不悖^[32]。夏保国先生指出，“（周代）采风制度应该是包括‘采诗’、‘献诗’、‘陈诗’一整套环节的制度……所谓瞽、师、工、矇、瞽的献曲、献艺、赋诵构成了相当完整的‘乐官’分职表”^[33]。这类采诗、献诗的职官所收集、整理的诗歌具有资鉴的功能。作为王官的瞽、师、工、矇、瞽及卿大夫，他们参与整理、创作诗歌的过程，即体现了周王朝的文化意志与权力，而作为胜利方的周平王，其采集、编撰褒姒相关诗文时，“体现了以周平王为核心的官方意志，这是褒姒形象被丑化的时代大背景^[34]”。

其三，从表面上看，姬、姜两姓贵族的权力斗争集中在申后与褒姒、伯盘身上，批评褒姒比批评幽王更符合继任者的利益需求。因为周礼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平王得位本来就有违君臣、父子之道，而对幽王的过度批判又会影晌周王室乃至周平王的合法性，因而选取这次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褒姒加以批判符合周人对本身利益的维护，也有“为尊者讳”的意图在内。因此，即使在西周末年，诗人也借批评权臣、艳妻（褒姒）才能隐晦地批评周幽王，由此可见在对西周君王的批评态度上，他们都是较为审慎的。李峰在分析《国语》《诗经》《吕氏春秋》乃至《史记》中的褒姒形象发展演变后指出：“诸如褒姒的身世、神秘的行为以及其诱使幽王欺骗诸侯，从而导致周王朝灭亡的一系列臆造，都是围绕着《诗经》中的某些核心信息构建起来的。这些信息表明她也许在幽王统治时期扮演了一个政治角色，从而使其成为担当王朝灭亡罪责的理想对象。”^[35]又，白国红、刘国忠二位先生在论述“周二王并立”与“《春秋》始于隐公”时就曾深刻地指出：“西周末期，宗法礼制一再遭到破坏，‘二王并立’局面是其极端表现，这一时期无论平王还是携王正统性均遭质疑……孝公、惠公时期《鲁春秋》中存在对平王正统性的不利记载，所以，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自然要隐去这段历史，一则为王室讳”^[36]。“《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春

秋》，包含了诤谏的功能在内，而其伦理要求则是维护周礼，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平王，同时也是幽王之子，无论他们父子间当时有多么剧烈的冲突，然而在重建周王室秩序时，君臣、父子之道仍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作为平王政敌的褒姒，正好承担了西周灭亡的罪责，这样的归因无疑有利于维护王室形象，减轻人们对幽王、平王及携惠王父子、叔侄之争的关注和批评，有利于维护周王室的整体形象和利益。当周人以近乎性别歧视和妖孽式的出身经历以及为尊者讳的方式，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系于一位女子的身上时，这样的做法早就偏离了事实本身，久而久之，经典化的《诗经》本身就造就了“美女祸国”论的舆论氛围和文化传统，而恰恰掩盖了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 [1] 崔述. 崔东壁遗书 [M]. 顾颉刚, 编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60.
- [2] [34] 梁中效. 《诗经》中的褒国褒姒述论 [J]. 安康学院学报, 2021 (6): 37-41+58.
- [3] 高本汉. 高本汉诗经注释 [M]. 董同龢, 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529
- [4] [10] 毛亨传. 郑玄, 笺. 毛诗传笺 [M]. 孔祥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264-267, 270.
- [5] [19] 朱熹. 诗集传 [M]. 赵长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203, 332-333.
- [6] 竹添光鸿. 毛诗会笺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1275.
- [7] [17] 夏保国. 先秦舆论思想探源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9: 99, 98-99.
- [8] 班固. 汉书 [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494.
- [9] [15]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577, 580.
- [11] 胡承珙. 毛诗后笺 [M]. 郭全芝,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967.
- [12] 高亨. 诗经今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83.
- [13] 赵逵夫, 注评. 诗经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215.
- [14] 公羊寿, 传. 何休, 解诂. 徐彦, 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 [M]. 浦卫忠, 整理. 杨向奎, 审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24.
- [16] [24] [25] [32] 左丘明, 撰. 徐元诰, 集解. 国语集解 [M]. 王树民、沈长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73, 474-475, 250-251, 11-12.
- [18] [20] 邵炳军. 文化变迁与“鸛鷖”意象的生成及演化: 以《鸛鷖》《瞻印》《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 [J]. 中州学刊, 2021 (1): 142-151.
- [21] 马银琴. 两周诗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45.
- [22] 徐铭灿. 褒姒灭周新论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4): 150-154
- [23] [28]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138, 138.
- [26] 李昉. 太平御览: 第1卷 [M]. 夏剑钦, 王巽斋, 点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740.
- [27] [31] 马银琴. “褒姒灭周”故事与《诗经·小雅·正月》的性质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 96-106.
- [29] 左丘明, 传. 杜预, 注. 孔颖达, 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 [M]. 浦卫忠, 等整理. 杨向奎, 审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696.
- [30]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63-64.
- [33] 夏保国.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4): 50-53.
- [35] 李峰. 西周的灭亡: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M]. 徐峰, 译. 汤惠生,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32.
- [36] 白国红, 刘国忠. 《春秋》始于隐公新解: 以清华简《系年》为切入点 [J]. 中国史研究, 2019 (4) 21-37.

责任编辑: 李蕾

渭河孕育：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

王雄刚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黄河被称为中国人的母亲河，黄河众多支流的奔涌汇聚前行，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象。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孕育出了华夏文明的早期形态，其中陇山根脉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陇山文化圈为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时至今日，我们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底蕴，渭河的孕育之功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维。

关键词：渭河 中华文明 根脉 陇山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4) 02-0049-07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和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也是维系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更是中国文化开拓创新的宝库。探源中华文明，需要端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鉴于此，寻迹母亲河——黄河的“流向”成为绕不过去的必然问题，其中最大支流渭河更是关系中华文明的源头。

渭河不算长，也不算大，却连接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文化的兴起均是围绕着渭河这条文化中轴线展开的。古代华夏民族的最鼎盛时期——周秦汉唐，充分彰显着渭河孕育华夏文明的绚丽华章。

一、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探索文明的起源，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通常具有决定性。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和长江等，均孕育过伟大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河流必然会孕育出一种文明，也不意味着河流越长、越大，孕育出的文明就越伟大^[1]。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大河，比如亚马逊河、刚果河等，并没有显现出孕育文明的强大功能，只有尼罗河、黄河、长江等与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联系在一起。

文明是指某一人群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文明的

收稿日期：2024-06-15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中华文化学院）2021年度招标课题“陇东南始祖文化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GSSYZB202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初始阶段,物质财富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人类而言,吃、喝、住、穿等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水不可或缺。在人类早期,要生存就需要基本的水量,同时人类摄入的动植物等食材,其生长也离不开水。

一条水量充沛、经流较长、流域面积宽广的河流,无疑能长久稳定地为特定人群提供充足的水资源。

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是多向度的,这使得人们对河流的选择不能仅是考虑水量,还要考量气候、地形地貌、土地等因素。地球上,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是温带地区,寒带和热带则不适合。试观孕育古代文明的几条大河,黄河、长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等均处于北温带地区。海拔高的地方空气稀薄,不适合人类生存,沙漠、陡峭的山区,也不适合人类生存。相比之下,温带河谷的开阔地带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故,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上游流域绝非偶然。

河流孕育文明的功能与特定河流支系及河流间的关联度密切相关。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影响到该河在某一文化圈的地位,如果与另一条大河的距离较近,中间的地理障碍也不是太大,就便于两个流域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互补,当然也有可能引起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冲突^[2]。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离得最近的两条大河,这促成了两个流域人们的频繁交往、交流,最后交融为一体。就黄河内部的支系而言,渭河等众多支流的奔涌汇入,为黄河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充分彰显了河流对文明形塑的影响。长期生活在同一流域的人们,通常会形成相同的生活方式,拥有共同的文化要素和社会心态。

河流不仅为人类提供着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水源和物资,而且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通和人员迁徙提供着主要通道。特定河流的文化经过杰出人

物的阐发和人民群众的传颂,就会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随着历史的演进,最终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品质和社会记忆。

鉴于上述分析,河流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文明之初,河流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水源和物资,并提供了迁移的主要通道;另一方面,河流催生出统一的国家政权,对人类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产生着巨大影响^[3]。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在河流面前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与之不断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人们在不同的流域环境中形塑出了不同的文化,进而塑造出不同的文明形态。

二、渭河及其孕育的文化

渭河,亦称渭水,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境内,有两大源头:西源和南源。西源是禹河,源于渭源县西鸟鼠山,为间歇性河流,河道短小,东流至清源镇与南源汇合;南源是清源河,源于渭源县西南的豁豁山,汇聚山区众多支流,长30多公里,为常年性河流,东北流至清源镇与西源汇合后始称渭河^[4]。据现代学者研究,距今500多万年以前,黄河是一条滚滚东流的大河,从兰州向东,经渭源鸟鼠山,呈“一”字状,沿渭河流域向东流,可以说渭河曾是黄河的古河道。

探源渭河,一般以西源为正源,即通常所说的,渭河发源于渭源县的鸟鼠山。鸟鼠山,又叫青雀山,是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名山之一,处于陇西黄土高原岭谷区,因鸟鼠“同穴止宿”而得名。相传:鸟名为蜎,似鹅而黄黑色,域内黄土滚滚,缺乏大树筑巢,鸟只能用鼠穴营巢下蛋;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处,以鸟为其报警,防老鹰侵犯。鼠在穴内,鸟在穴外,各自繁衍,互不侵害。“大禹导渭”将渭河疏通的壮举被称为“洪水至,文明兴”,《尚书·禹贡》记载“导渭自鸟鼠洞穴^[5]”,即大禹凿穿渭源鸟鼠山,让河水改变了方向,最终平息了水患。鸟鼠

山不仅是渭河的发源地，也是渭河与洮河的分水岭，当我们在高处鸟瞰渭河与洮河时，两河的最远距离仅几十公里，虽然殊途却同归汇入黄河。

渭河大致可分为东西二段：西段为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段为关中平原区。从渭源发端，渭河东流过陇西县，于鸭儿峡向东南注入天水市武山县，南岸有榜沙河、山丹河、大南河汇入。再东流入甘谷县，北岸有散渡河注入，到秦州区和麦积区后又有葫芦河由北岸注入，藉河自正西方向汇入，再向东由清水县流经的牛头河汇入。之后过小陇山，在陇山与秦岭的夹峙下，冲出宝鸡峡，行向一片坦荡的关中平原，流经陕西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地，途中北纳千河、泾河、洛河，南汇秦岭北坡诸水，最后在潼关汇入黄河^[6]。渭河蜿蜒奔流 818 公里，流域面积 13.48 万平方公里，在中华大地的中部腹地开辟出一条自西向东的生命线，滋润两岸，造福秦陇人民。

渭河主要流经了甘肃和陕西两省，甘肃段为黄土丘陵沟壑区。这里南有东西走向的秦岭横亘，北有六盘山屏障，使得渭河上游流域山川肥美、气候宜人，孕育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形态。事实上，中国内陆存在着黄河、长江、珠江、西拉木伦河—辽河及松花江等诸大水系，各大河又由众多支流构成，这些大河及其支流都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渭河为中华文化与文明早期形态的孕育、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最大、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渭河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第一母亲河^[7]。

渭河上游地域辽阔，文化遗存丰富。现存的诸多遗址考证表明当地有大量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也有少量的寺洼文化、周文化^[8]。其中仰韶文化最为古老和典型，突出的代表为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五营镇邵店村东，坐落于陇山西侧葫芦河支流清水河中游的台地上，这里南依山丘，北傍河川，风景秀丽。大地湾遗址是一处完整的原始部落遗址，遗址内

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是一颗深埋于地下的文化明珠，一经发掘即引起了轰动。大地湾遗址从时间上讲，并不是国内发掘的最早文化遗址，然而该遗址全面地具备了新石器文化所具有的诸种文化特征^[9]，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距今约 8000 多年，拥有六项国家考古之最，即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和中国最早的绘画。

大地湾遗址与传说时代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均不远，伏羲诞生于清水河汇入的葫芦河下游。顺着大地湾遗址所在的清水河逆流而上 3 公里，就到陇城镇了。陇城镇建有女娲祠，据传女娲与伏羲同为兄妹，这一传说就将伏羲、女娲和大地湾遗址关联了起来。事实上，大地湾考古发现与伏羲、女娲、轩辕等的传说和记载并不冲突，相反一定程度上在相互印证^[10]。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佐证共同揭示了陇东南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三、渭河孕育出的陇山根脉

渭河孕育出的渭河文明，滋养着域内的陇山文化圈。陇山，是指位于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交界处的山脉，包括关山、陇山、崆峒山、六盘山和麦积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名山。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考究，陇山横亘于秦岭西端，北起宁夏海原西华山，南至宝鸡渭河畔，长约 240 公里，宽 40 至 60 公里不等，大体呈南北走向，将黄土高原分割为陇中高原和陇东高原^[11]。陇山是关中和西部的人文地理分界线和交汇线，渭河上游和泾河上游分别从陇山西侧和东侧流出。

陇山的“陇”为垄也，即田埂，意为山脉纵横如田埂。陇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陇山亦即小陇山、关山；广义的陇山又称大陇山，是指以小陇山为中心，辐射至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平凉和庆阳，以及宁夏固原等广大区

域,囊括了渭河中上游和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即泾渭流域^[12]。这个区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孕育之地。特殊的区位和地域格局,赋予了陇山地区文明交融与多元文化交汇的优势条件,孕育出了开启华夏文明的始祖文化,孵化出了奠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周秦早期文化,拓展出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多彩的宗教信仰以及独具韵味的陇山文学意象等。这一切使得围绕陇山的陇东、宁南、陇西和关西等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陇山文化圈^[13]。

陇山不仅是半干旱和干旱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农耕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分界线,更是先秦“夏夷之别”的分界线^[14]。从文化形态上来说,陇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黄河中上游古文明的中心,远古传说中造人补天的女娲、“一画开天地”的伏羲、教人稼穡遍尝百草的神农氏皆出于此,特别是域内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将华夏文明溯及至八千年。擦去历史的烟云,陇山地区厚重的文化遗存蕴藏并传承着华夏的血脉精神,这里不仅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炎黄文化的诞生地,也是周秦文化的哺育地、汉唐文化的交流地、宋元文化的传承地、明清文化的保存地,更是红色革命文化的摇篮地^[15]。鉴于此,陇山地区可称之为华夏民族的根脉之地。随着华夏民族的发展壮大,陇山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周秦王朝曾在这里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所谓“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在这里有着生动的写照。

“祖籍陇山”的伏羲、女娲、轩辕和西王母等中华人文始祖,在渭河流域留下了不可湮没的印迹。陇山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典型的本源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充分印证着其是孕育渭河文明和黄河文明的重要区域,肇启着华夏文明曙光。

鉴于上述分析,陇山可谓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事实上,陇山根脉彰显着中华文化“有容

乃大,海纳百川”的气度。潘岳先生在《中西文明根性比较》一书中指出,与西方文明强调“自由优先”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在于“秩序优先”^[16]。“秩序优先”形塑着中国的大一统文明,其首要价值在于长久和平。实际上,在陇山始祖那里,始终如一地体现着人与世界万物的和合共生。

陇山地区的始祖文化遗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7]。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魂和中华文明之根都与陇山地区有密切的关联。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当地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夹杂回族的民族分布格局,随着晚清民国“人多地少”矛盾的凸显,陇山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不复存在,反而成为单一的农业区,并走上了贫困化之途,形成了环六盘山的深度贫困区。这与历史上曾经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陇山福地”形成巨大反差。鉴于此,系统研究陇山文化圈,基于古代陇山地区历史文化繁荣的发展,揭示其“迟发展”的内在机理,或可为当下强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借鉴。时至今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中,陇山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系统探讨陇山文化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重大的现实关怀。

四、溯及华夏文明八千年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广泛讨论了,但其不足之处是仅强调考古发掘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作用,却忽视了文献、传说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18]。基于此,笔者统摄考古发掘、文献考据和民俗传说各维度,通过社会记忆的视角来探析中华文明的源头。事实上,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生产和保持关于社会过往的知识、意识过程称之为社会记忆时,作为以生产和延续这种知识和意识为目的的历史学科,显然属于社会记

忆的一部分^[19]。通过社会记忆的路径来展示文明的起源，实质上是对始祖文化做“深描”处理，属于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0]。

中华文明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坊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看山西，五千年文明看河南，八千年文明看甘肃^[21]。在甘肃，华夏文明的曙光起始于陇东南。

我们常用“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来概括中国历史的悠久和版图的辽阔。其实“上下五千年”并未将中华文明尽数囊括，大地湾遗址将华夏文明上溯至八千多年。鉴于此，可以说，陇东南是华夏文明孕育的一方温床，陇东南文化与其他地区的远古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汇聚形成了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

在文明起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层面，学界普遍认为，地理环境在文明开启时代颇具重要性。事实上，离开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水文和地貌特征等，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便失去了客观基础。依据地理环境对文明起源的重要影响，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其中又以黄河文明最为重要，属于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在与北方草原文明相互碰撞的同时，不断向长江流域拓展。在明确黄河流域孕育中华文明主源头的基础上，我们还需在黄河的段位、支流中探寻华夏文明的根脉。这其中，作为黄河最大支流的渭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渭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处于渭河流域上游的陇中、陇东南有着中华文明的众多遗存，是渭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孕育出的中华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色彩，内涵广博，生命力旺盛^[22]。考古表明，在远古时代，渭河上游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植被茂密，非常适宜人类繁衍生息。基于此，也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星火，比如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至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轩辕等多汇集于此，后来的周人、秦人的发祥地也在于此。

以陇山为界，大致可将渭河分为东西两大板块，陇山以东是关中平原，为农耕区；陇山以西，则是游牧区。以渭河为界，渭河以北大体属于黄土高原区，以南则属于秦岭山地。这种多元并存的地域格局，使渭河流域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发展条件。在距今3000年前，渭河流域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即华夏，其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将周围的部族吸纳进入这个核心^[23]，最终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渭河流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各民族多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使这里吸收融合了众多的不同文化。自古以来，这里是许多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西运丝帛，东来佛教，这里可以东出关中、西通西域、北进塞北、南下巴蜀，有“据一地而扼四方”的影响力^[24]。

渭河上游是解开中华文明起源的钥匙。在秦安境内的清水河畔有距今八千多年的大地湾遗址，传说中伏羲成长的成纪位于渭河支流葫芦河流域，黄帝出自清水县轩辕谷，等等。曾经渭河两岸的上古文明如同星火一般灿烂。顺着渭河的流向，夏、周、秦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国家政权。秦之后，汉、隋、唐三个王朝的兴起，均与渭河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五、结论与讨论

渭河是一条承载中华民族厚重历史文化的母亲河。“三源孕鸟鼠，一水兴八朝”，渭河流域是周、秦、汉、晋、北魏、北周、隋、唐中国历史辉煌时代的渊源，是华夏文明的血脉之源，是秦陇大地的情感之源。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得渭河流域文化遗存俯首可拾，也使渭河在时间维度和空间向度上具有无限张力。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一直都在求索: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要如此这般行为?事实上,神话和传说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25]。渭河上游孕育出的陇山文化意象,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脉。在这里,远古始祖为华夏儿女阐发着“人之为人”的根和魂。

针对中华文明探源这一议题,要坚持“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观,将中国按“横向”划分为类型化的区域,展开区域与地方史的研究,在“纵向”上关注基层社会的表达,在此基础上促成跨学科研究^[26]。基于此,在河流孕育文明的视域里,渭河上游虽然不长也不宽,但兼具农耕和游牧优势,能产粮产盐,有便利的交往通道。在渭水的滋养下,古老中国的文化横轴在这里徐徐展开。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诞生于此,创八卦、教渔猎、造文字,开创了华夏的远古文明,黄帝诞生于清水县轩辕谷,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开启了华夏文明,可以说渭河上游是解开中华文明源头的密钥。

总而言之,承载几千年文明的渭河,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启迪着中国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值得我们及后人认真思考、重新认识,进而传承创新,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 [1] [2] 葛剑雄. 黄河与中华文明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2, 8.
- [3] 葛剑雄. 河流与人类文明 [J]. 民俗研究, 2021 (6): 5-13.
- [4] [11] 郭方忠, 等. 甘肃大辞典 [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 33, 31.
- [5] 尚书 [M]. 王世舜, 王翠叶,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7.
- [6] 张振宇. 渭河, 孕育出绚丽的华夏文明 [J]. 丝绸之路, 2016 (21): 45-55.
- [7] 张忠培. 渭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

-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4 (11): 6-12.
- [8] 天水史话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23.
- [9] 汪受宽. 陇史新探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27.
- [10] 孙周秦, 宋进喜. 走进大地湾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55.
- [12] 霍彦儒. 试论史前陇山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陇山文化发展论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9.
- [13] 雍际春. 陇山文化刍议 [J]. 敦煌学辑刊, 2021 (4): 197-204.
- [14] 辛德勇. 黄河史话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1-73.
- [15] 陇山文化发展论集·绪论 [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
- [16] 潘岳. 中西文明根性比较 [M]. 北京: 新世纪出版社, 2022: 39.
- [17] 王雄刚, 张玉斌. 中华始祖文化初探: 陇东南人文始祖的神话记忆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3): 68-73.
- [18] 李清凌. 华夏文明的曙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 [19] CUBITT. History and memory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
- [20]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5.
- [21] 安文华, 李骅. 华夏文明八千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225.
- [22] 焦国成. 渭河: 中华文明的源头与中华人文精神 [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6): 26-30.
- [23] 费孝通. 中华文化的重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
- [24] 徐杰舜. 雪球: 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66.
- [25] HAVILAND W A. Cultural anthropology (Tenth edition) [M]. Singapore: A division of Thomson Asia Pte Ltd, 2002: 30.
- [26] COHEN P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6.

责任编辑: 刘悦

元典、原生态——黄河文化 陕西段的文化标识及现实价值

王雪婴

(西安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文化陕西段,是黄河文化的主体部分,以元典时代文化和民间原生态文化形式呈现。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文化陕西段发生巨大流变,对其进行保护传承是黄河文化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设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初衷。

关键词: 元典 原生态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55-05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这些都旨在推动构建黄河文化价值体系、黄河文化地标体系,挖掘黄河治理文化,保护传承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流经九省区,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保护黄河、挖掘黄河文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陕西地处黄河中游,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陕考察,都提到“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黄河陕西段,历史上十三个王朝定都于此,其中周、秦、汉、唐四个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

形成发展的四个重要节点,经历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华文化元典,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框架,留下了灿若星辰的古代文明遗存。今天,在黄河流经陕西的三市十二区县(榆林: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安:延川,延长,宜川;渭南: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当地的原生态文化,其精神内核仍然流淌着元典时代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深层精神力量,值得我们保护与传承。

一、黄河文化陕西段的文化标识

黄河在黄土高原的东缘纵切黄土高原南下,形成晋陕大峡谷,陕西处于黄河中游西岸。黄河在古代称“河”,称为“黄”河正源于这一段支流众多,泥沙随黄土高原冲入河道而遂成“一

收稿日期:2024-06-15

作者简介:王雪婴,女,西安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西安地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碗河水半碗泥”的“黄”河。陕西黄河沿岸，由于不断水土流失，自然生产条件越来越差，生态恶化，农业落后；黄河的众多支流造成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较大规模城镇难以发育，工商业落后。愈到封建时代后期，这种落后状况愈加突出，明末的李自成、高迎祥农民起义，清末回乱都是这种经济社会矛盾爆发的体现。近代以来，陕北能成为革命圣地，也是和社会底层群众高涨的革命需求有关。这样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使得政治制度、人口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格外显著，当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处于这一区域时，形成了形塑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元典文化；当政治中心转移后，则呈现出一种非常“苦情”的、直抒胸臆的民间文化，就如同“千里黄河一壶收”的壶口瀑布一样，怒吼咆哮而下，又如代表性的陕北民歌和秦腔。

元典时代，陕西黄河沿岸文化，在内容上反应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顽强生存的强大意志。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沿岸，后稷教民稼穡，文王为后世树立了明君的榜样，周公制礼作乐，将中华民族带入人文理性时代，儒家文化自此滥觞。元典时代为我们留下《诗》《书》《礼》《易》的文化大观。孔子把《关雎》篇作为《诗经》的首篇，评论这篇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既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对元典时代人民精神状态的总体评价。周礼秦制、汉风唐韵，无不是这种精神的流布。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夏传才在他的《〈诗经〉发祥地初步考察报告》一文中首次对《诗经》的源流进行了考证，指出《诗经》305篇中，发生在陕西地域的诗歌大约有162篇。西汉司马迁在黄河岸边，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黄河岸边的人们至今对司马迁祭祀不辍，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今天陕西文旅界，经常说的北线旅游线路“三黄一圣”，即

是指黄土高原、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和革命圣地延安。黄河出陕西的韩城合阳潼关一带，有大禹治水留下的“鲤鱼跳龙门”传说，有《诗经》第一首《关雎》发生地，有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司马迁故里。这些宏大的文化意象，最容易让人们产生对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集体认同。

现存的原生态文化，内涵了元典时代的文化基因，由于黄河沿岸基本上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程度不高，原生态文化得以广泛保留，世界、国家、省、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均有录存。以世界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三市十二区县入选世界级非遗名录的有2项：皮影、剪纸。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1项：秦腔、华阴老腔、陕北民歌、陕北道情、榆林小曲（府谷小曲）、陕北秧歌、府谷二人台、宜川胸鼓、陕北说书、（绥）米（脂）唢呐、白云山道教音乐、陕北民谚、绥德石雕、延川剪纸、陕北窑洞营造技艺、陕北匠艺丹青、合阳跳戏、合阳提线木偶戏、韩城秧歌、韩城行鼓、徐村司马迁祭祀。可以看出，原生态文化主要以歌谣为主，分布在陕北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单调艰苦的自然环境，催生了黄河沿岸人们细腻的情感、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和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

二、黄河文化陕西段的特点和现实影响力

陕西黄河沿岸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黄一圣”。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河既滋养了中华民族，也在危难时期鼓舞激励中华儿女不屈奋斗，抗战时期光未然、冼星海创作不朽歌曲《黄河大合唱》即是其代表。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摇篮。“三黄一圣”在今天以旅游线路闻名，游览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开启一场文化之旅、寻根之旅。黄河流到富饶的关中平原，则成为十三个王朝都城的天然

安全屏障，创造了西周的“成康盛世”“宣王中兴”，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庇护了无数王朝精英进行文化创造，留下了无数人文胜迹和文化宝藏。在陕西当代艺术中，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画界的“黄土画派”、八十年代流行音乐“西北风”，文学创作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彦的《装台》《主角》等，都是对宏大主题的思考。

民间原生态文化在于白描、直抒胸臆，特色格外鲜明。近年来，主流媒体、国家级传播平台广泛传播陕北民歌、华阴老腔、腰鼓，特别是华阴老腔，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之所以被现代人接受，缘于其热烈、高亢、悠远的艺术感染力，契合了现代人普遍压抑情绪释放需求。陕西黄河沿岸的民间艺术，无论是歌、还是舞，无疑首先都是体力活，从秦腔、老腔到陕北民歌，都是直嗓，没有假音，秦腔演唱更是被称为“吼秦腔”，腰鼓、胸鼓、行鼓类，多和祀与戎有关，有种“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气势。

黄河文化陕西段的现实影响力，就元典文化而言，早已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元典文化的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大传统”的命运如何，元典文化都活在百姓日用之间。民间原生态文化受地域局限，大众主要通过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领略其魅力，其对当代艺术家影响较大的当属当代陕西文化代表性人物，如音乐家赵季平、导演张艺谋、吴天明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和创新于一体，旋律富有地方性、构图有力度、意象丰富、色彩饱满。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活着》《秋菊打官司》，吴天明《百鸟朝凤》《老井》（张艺谋主演）《人生》《红高粱》，张艺谋摄影、赵季平

配乐的《黄土地》，从故事到音乐，都富有浓郁的黄河黄土风情。《活着》电影音乐有华阴皮影老腔，《黄土地》电影有大量的陕北民歌和腰鼓表演。特别是近年来张艺谋担任国家大型活动表演环节总导演，2008年夏季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浓浓的中华文化韵味，征服了全世界观众。可以说张艺谋在这些大型表演中，将元典时代文化和民间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艺术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张艺谋本人艺术灵感的根在黄河边、黄土地。

文学创作上，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是黄河文化的象征，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民歌、民俗、鼓舞，让人们看到了黄土高原文化的面貌。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陕西带动了一个文化产业，在全国也是超级文化IP，如小说、话剧、电影、电视剧、秦腔、舞剧，民俗村、影视城等等。《白鹿原》的成功得益于陈忠实将元典时代儒家文化“仁”“圣”的大雅、与芸芸众生在大变革时代众生相的大俗结合在一起，演奏了一曲中国农耕文明的挽歌，以大雅大俗的文化冲击力征服了各个层面的受众。之所以在《白鹿原》电影、话剧、舞剧、电视剧中，都用了民间艺术华阴老腔，是因为华阴老腔强化了《白鹿原》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白鹿原》将一个濒临失传、只在黄河畔一小村子张户人家流传的古老民间艺术，推向全国，使之走向世界。2006年6月，濮存昕担当主持的一场秦腔和老腔的专场演出《老腔·秦腔〈白鹿原〉原生态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2015年，谭维维用《给你一点颜色》把华阴老腔带上《中国之星》的舞台，接着，在2016年春晚上，华阴老腔又向全国人民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一群连在小县城里也没有生活过一天、年龄多在50

岁以上的老农民，却受邀在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演出。在全国所有的非遗项目中，华阴老腔的传播与影响是非常成功的。

三、黄河文化陕西段的传承与发展

(一) 黄河文化陕西段发展现状

元典时代的文化，因为近 20 年持续的传统文化热而得以复兴传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习近平在国外访问时指出：“2000 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1]2017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2]元典时代的文化迎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西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打造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人文之都”，目前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总量的 18%，属于支柱型产业，其底气来自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全社会旺盛的文化需求。

原生态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元典文化的热闹大相径庭，绝大多数处于濒危状态。原生态文化的危机始于改革开放，受市场化、社会流动、生产力发展、交通便捷、现代传媒发展等等要素影响，原生态文化发展式微甚或消失。文化的载体是人和环境，老一辈人去世，年轻人进城求学或打工，城镇化进程消灭大量的自然村寨，使得原生态文化传承困难。陕西黄河沿岸的原生态文化，特别是说唱歌舞类，今天在原生地几乎难以自然流传，主要以服务地方旅游业为生，在旅游景点展演，迎合游客口味；还有一部分在城市特色餐饮店、人造民俗村表演；另一部分随着进城

农民的记忆，演化为广场舞，如秧歌、各类鼓舞。但第三种传播方式局限有二：一是因为扰民会被城管限制，二是只限于同一地域文化人群聚居区，不容易被多元文化人群所接纳。这也是全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文化发展困境。

(二) 黄河文化陕西段的传承与发展

没有原生态文化，所谓的雅文化就失去了“根”。2021 年 3 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讲“失诸朝，求诸野”，我们今天重视传统文化，如果传统的根——原生态文化消失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2006 年 4 月生效，这一《公约》拯救了中国的原生态文化。国务院先后于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和 2021 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前三批名录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后，名录名称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5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国家 + 省 + 市 + 县”共 4 级保护体系，明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要求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政策措施有了，实施效果如何？只能说保护、抢救的工作开展起来了，但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之路还很艰巨。为此，传承和发展黄河文化陕西段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新一轮乡村振兴规划中，设立原生态文化保护地。像华阴老腔所在地，村容村貌、

生活方式不允许破坏性改造，更不允许拆迁占用，已经拆迁的，要以乡镇文化馆分馆的形式复建。同时，要组织非遗传承人活化传承。

第二，完善非遗传承教育体系。非遗所在地中小学要开设地方文化课，学习方言、民俗、非遗。依托各地地方师范院校，设立非遗学院，全国工艺艺术类院校要有相关专业。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要吸引年轻人专业学习民间艺术。

第三，激励措施。对典型非遗传承人，要认定等级，给予荣誉，提供经济保障。例如，参照国家艺术类岗位等级，给予同等岗位津贴。年轻人选择大学非遗专业，跟随老艺人学艺，一定年限拿到大学学历，国家给予高于当地同龄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薪资，吸引他们留下来做传承人，当然也要有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

第四，鼓励艺术家走向民间，扎根基层，提升非遗利用水平。2005年9月24日，74岁的纳西族歌王肖汝莲作为唯一的嘉宾，受邀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参加崔健个人演唱会，演唱《栽秧调》《月亮姆》《嫁女调》《江边调》纳西民歌，受到现场观众及美联社等中外媒体的高度赞扬，使纳西古歌一夜之间蜚声海内外。2015年，谭维维用《给你一点颜色》把华阴老腔带上了《中

国之星》的舞台。这都是现代艺术家参与传承原生态文化的成功范例。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中华民族的强大离不开黄河文化的精神滋养，其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动力源泉。把黄河文化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是当务之急，做好这项文化工程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切实打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推动黄河文化在未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展重要演讲 [N]. 光明日报, 2014-04-02 (0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5651269.htm?trs=1>.
- [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10-15 (01).

责任编辑：刘悦

社区社会组织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

张晓铮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社区是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治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为主发起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重要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社会组织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其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价值、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着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社区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以及缓解当前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4) 02-0061-0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体制,确立了目标。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有效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是形成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合力的关键所在^[1]。作为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为主发起成立,是社区重要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社区是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治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微观、最基础的治理主体,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社会组织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202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民政部《培育发展

收稿日期: 2024-06-15

基金项目: 西安财经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诉源治理的实践与探索——以西安市‘无讼社区’建设为例”(23YC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铮,女,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法治、土地问题。

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 年）》指出，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系统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等服务计划。这些政策都明确了要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规划，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使新时代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快速积极地融入社区治理体系、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已有一定的发展，并成为社区治理重要的主体和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其以独特的方式在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价值日渐彰显。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组织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社区社会组织超过 175 万家，其中约 10% 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约 90% 的社区社会组织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或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指导管理^[2]。而仍有一些社区社会组织还处于统计范围之外。我国 65% 以上的社区都有老年人养老服务、残疾人助残服务、社区生活以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社会组织。一个涵盖社区服务、社区事务、文化体育、慈善救助、社区维权等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正在形成。这些组织在参与社区管理、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反映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应急救援、努力培育社区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区居民通过文体类组织，在频繁的社区文体活动中逐步熟悉起来，其交往范围也不断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一些社区社团深入居民日常生活，及时代表居民反映诉求，作为连接政府和居民的桥梁，拉近了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距离，为居民管理社区事务提供了平台；

一些专业服务组织、社会矛盾调解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及时高效地解决社区矛盾，节约了司法资源。可见，社区社会组织正以“微主体，大作为”的姿态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舞台上。

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虽然社区社会组织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仍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及效果。

（一）对社区社会组织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人们对社区组织的关注基本集中在党支部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以及业委会等组织上。一般认为，这些组织属于体制内或接近体制的组织，其地位重要，组织规范，经费有保障，在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大。而社区社会组织大多是社区居民自发组织成立的社会组织，多为文化娱乐性组织，一般都规模小、地位低、较松散、能力弱，似乎与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不着边”。这种认识误区，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其次，社区社会组织合法性缺失也是导致其身份认同感不高的一大原因。合法性反映一种被认可、被赞同的价值，它表明某一主体具有被承认、被接受、被自愿服从的基础^[3]。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而言，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障碍。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是熟人社区的地方传统、利益联结以及共识的规则或秩序，社区社会组织通过适应内部环境来获得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具有强相关性，社区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获得合法性^[4]。我国通过“自上而下”建设的社区社会组织有相当一部分具备行政合法性，但是在实践上往往否定了社会合法性的存在，这就导致了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另外一部分由社区居民自主建设的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

社会基础,更容易得到社区居民的信赖和支持,但这些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组织大多数缺乏行政合法性,使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面临严格的制度限制。合法性身份的缺失对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和服务的供给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受限较多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受到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基层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的重视程度以及社区人员结构、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社区居民基本是“陌生人”和独立个体,利益诉求差异化突出,设立社会组织的意愿低,动力不足,缺乏领头人。加之,社会组织设立的条件严格、门槛高,真正注册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并不多,还远远达不到民政部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

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资金来源渠道有限,主要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中拥有高度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政府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会干预社会组织,两者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影响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5],从而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受限,对外拓展能力低,难以做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存在一定的外部信息壁垒,与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缺乏有效顺畅的信息获取与交换的沟通渠道。沟通渠道的闭塞可能导致社区社会组织缺乏资源获取、合作、创新的机会,进而影响其自身建设和服务治理。

(三)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运行质量不高

一方面,从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运行来看,质量可虞。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数量少,还存在类型少、规模小、较松散、地位低、人才少、经费缺、活动难等一系列问题。从类型上看部分群众自我娱乐的团体较多,社会矛盾调处、自我管理以及专业问题咨询等自治类的社会组织缺

乏。随着时代的发展,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目前,能够提供更为专业的咨询服务、进行自我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较少,难以满足社区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文体类的组织活动次数多、参与人数多,居民的参与热情度也更高,但其他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所占比例较低,且活动举办主要依靠的是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参与群体范围较为固定,覆盖群体范围小。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监管制度不健全和人员管理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在监管上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尚未构建健全的监管机制,内部人员管理也不尽完善。面向社区居民的社区社会组织基础事项也尚未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居民的监督管理保障没有落到实处。

(四)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较弱

首先,社区社会组织较为松散。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章程,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这导致了其运行效率低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大多具有间接性的特点,松散的组织更加弱化了其参与治理的效果。

其次,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缺乏专业性。组织内部成员整体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水平和质量。目前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工资水平低,内部成员以志愿者为主,社会组织存在内部成员年龄大、学历低、专业性低以及难以吸收新成员等问题,且这些成员既不具备专业的技能知识,又缺乏必要的培训,这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时发挥的作用有限^[6]。

最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目前,社区层面绝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独立开展活动,仍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缺乏社会工作的手段和能力,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居家养老中心”在资金、资源、人员

管理上都高度依赖政府,靠政府“喂养发育”,无法“独立生存”。社区志愿者团体发育不完善,“红袖章”“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简单拼凑,相互推诿,责任不明,难以形成合力,整体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

四、社区社会组织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一) 正确认识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价值

要正确认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价值,尽快走出误区,特别是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首先要提高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认识,既要正确认识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特点,也要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独特方式和特定作用,充分发挥其作用和价值。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参与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社区社会组织要认识自身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使命和任务,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使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感受到幸福感、获得感。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新主体,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党政的思想引领与政策引导。党和政府领导并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为社区组织发展提供治理资源和治理平台^[7]。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可加强党和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联系,实现及时向下传达国家政策,向上反映居民需求。同时,党和政府的支持赋予了社区社会组织合法身份。社区社会组织在党建引领和居民参与的双重作用下,有力推动了国家治理和居民自治在社会治理中的融合。

(二) 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其与社区居民人员结构、职业分布、文化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一些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文化娱乐性的组织容易发起设立,而一些具

有一定专业性、技术性的组织限于社区人才、大众认知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发起成立。对此,基层政府、街办、社区党组织及“两委会”应积极引导、指导、扶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设立,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指标化为设立而设立。对已成立,但比较松散、不规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社会组织,应加强指导、培训,支持其注册登记,规范化运行。

(三) 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及时转变工作思路,积极促进社区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建议地方政府出台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扶持措施,涉及发起设立条件程序的简化便利、活动场所经费的提供与支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接的倾斜与优惠、负责人政治与业务的指导与培训、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与评估等。

政府应出台《关于推进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明确重点发展专业型社区社会组织,优先培育扶持一批参与治理能力强、效果好的社区社会组织,充分保障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要规范管理,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降低社区组织准入门槛,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按照“最多跑一次”要求,加快审核程序并简化登记程序;对规模较大但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组织,由乡镇、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管理并加强指导。在人才培养、资金保障等方面对社区组织进行政策倾斜,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组织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社区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支撑。完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推动“五社”联动,进一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区搭台、广泛参与的治理局面^[8]。

(四) 着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在积极鼓励引导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优化社

会组织结构、提供必要的设施条件的基础上,要着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和实践能力。为此,要建立党委统筹联动机制,形成社区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联动的工作格局,以党的建设引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要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积极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及时、高效参与社会治理,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在日常的工作管理中也应当积极以党建为引领,加强自我管理。

组织学习和培训,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意愿、有思想的人才加入,提高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素养,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模式。要从当地社区中挖掘人才,因为他们对社区基本情况较为了解,能够以更加合适高效的方法处理社区问题,做到事半功倍;加强与高校合作,链接高校、社会组织及专家智库等外部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邀请专家、学者对社区遇到的治理难题进行分析并探讨解决方法^[9]。

建立激励机制,对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突出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表彰。政府要制定人才吸引政策,为专业化人才加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激励,提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志愿者是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应将一些表现突出的志愿者树为志愿者先进榜样,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公开的宣传和表彰;要大力弘扬社区文化,营造

良好的社区氛围,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贾志科,罗志华.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面临的问题与路径选择[J].学术交流,2020(3):134-143.
- [2] 李昌禹.全国社区社会组织超过175万家[N].人民日报,2023-07-17(4).
- [3]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2):100-109+207.
- [4] 刘春湘,邱松伟,陈业勤.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中州学刊,2011(2):106-110.
- [5] 汪来杰,李志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J].三晋基层治理,2023(2):47-52.
- [6] 白志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3,25(9):38-43.
- [7] 李杏果.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1):70-78.
- [8] 万玲.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实践路径:基于对J社区的观察与分析[J].领导科学,2022(6):110.
- [9] 赵安然.公共性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南通市A社区为例[J].住宅与房地产,2023(19):91-93.

责任编辑:唐倩